

版出會究研濟經村農國中

戰時
特刊

中國農村

第七卷 第三期
新 年 號

迎接民國三十年

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

歐戰帶來的農業恐慌

農業工作者往那裏去？

中國農民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淪陷區的農村經濟

農村調查：祈門毛茶的產銷過程

浙西崇德縣的反食汚鬥爭

通訊 計日校糧在浙飯

千家駒

陳翰笙

張西超

項德崇

朱智賢

秦柳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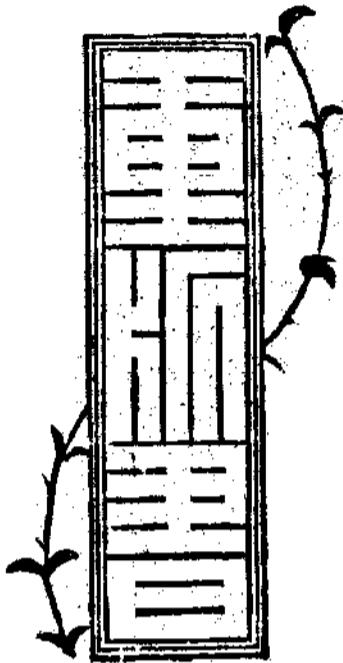
唐海

綠明

向辛

桂林新知書店發行





五版 經濟學

薛暮橋著

本書為薛暮橋先生力作，從原始社會聯起，直到資本主義社會恐慌時代為止，對於各階段社會形式的發展，勞動價值說，農業經濟，殖民地經濟等部分，都有獨到的說明；而且隨着理論的分析，引證中國的實例，是一本適合中國國情

和中國讀者的經濟學入門書。

【定價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新家庭論

斯維特洛夫著
常業生譯

本書原名「社會和家庭」，作者以極正確的立場把各社會各階段的家庭互相比較，並敘述蘇聯建立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新的家庭的努力，批判各種不正確的理論和傾向，全書描寫生動，理論深刻，為現代青年優良的讀物。

定價四角

各地
新知書店發行

中國農村月刊

第七卷 第三期

三十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人：

千家駒

出版者：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桂林施家園三十九號

發行者：

各地
桂林 新 知 書 局
桂林 桂 西 路
重慶 民 生 路
貴陽 中 華 南 路
昆明 華 山 南 路
香港 擺 花 街

印刷者：

青年書店桂林印刷所
桂林交通路二十六號

定價

零售	本埠一角	外埠二角二分
預定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迎接民國三十年

千家駒

信頭卷

我們在艱苦危難中渡過了民國二十九年，今天又是民國三十年的新年了。在三年半的奮鬥中，我們雖然已經奠定了抗戰勝利的基礎，敵人的泥足雖然愈陷愈深，但正如蔣委員長在本年元旦訓示我們所說：「敵人失敗命運的決定，并不就是我們勝利之真正實現，我們國家民族還沒有脫離危險，我們抗戰的前途實在還更經過更大的困苦艱難，全國軍民必須要準備更英勇的犧牲奮鬥，才能求得最後完全的勝利」。這是一點也不錯的「今年這一年，將是我們歷史上最艱辛最重大的時期」，就是「決定我們盛衰存亡的關鍵」。所以我們今天不應該以虛誇的半句自滿，而應該本著「戒慎恐懼」如履薄冰的態度，「以堅強的自信，作確實的努力」。因此我們迎接民國三十年，不願致空泛的頌辭，祇願指出我們如何作「確實努力」的方向，在農業經濟上，我們希望做到下列幾件事：

- 第一，豁免戰區人民一切近于苛重的稅捐負擔。
- 第二，對於大多數農民大業所負擔的稅額，為之作高度的獎勵與減免。
- 第三，厲行「二五減租政策」，即實施土地法中第三章第一節耕地租用條款「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穫總額百分之三七五，約定地租之超過百分之三七五者應減為百分之三七五」之規定。
- 第四，切實執行行政院取銷重利剝削農民的命令。（去年十一月二二日中央社訊）
- 第五，徹底改革稅務行政制度，嚴禁貪污中飽。
- 第六，保障農民的最低限度生活。

為了要使上述幾項不致成為具文，我們必須健全民衆組織，實行民主政治，因為無論是減租減息或清溝食污，光靠政府的一紙命令，或嚴刑酷罰，是不會奏效的。必須民衆自己有了組織，有了行使民權的機會，這樣才能使政府的良好法令，得有兌現的保證。因之在農村政治上，我們希望能做到：

- 第一，推行地方自治，實施鄉村長民選。
- 第二，健全基層行政機構，以杜絕貪污劣紳把持操縱之門。
- 第三，突破文化下鄉，以提高一般農民之文化水準，（但這是與提高農民之經濟地位有密切關係的，如果不從提高農民之經濟地位而空談「抗戰之勝負，不備取決于兵力，尤取決于民力」，這是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昭示我們的原則。「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于全國廣大的鄉村」，則是蔣委員長在三年前昔國民書中之名言。但可惜的是抗戰三年半以來，大家還沒有充分認識全國大會宣言及蔣委員長這兩句話的重要意義。誰也知道農民是支持中國抗戰的支柱，農村是中國經濟生活的重心，然而三年半以來，大家似乎為農民打算得特別少，除了農村放款，及合作社等等之外，似乎我們始終沒有觸到農民生活之中心問題，這是非常之不夠的。然而得不到農民之熱烈支持，不發動廣大之農民來踴躍參加抗戰，最後勝利是不可能得到的。所以我們在這三十年的歲首，特別提出如何改善農民經濟生活及改進農村政治問題以促進全國人士之注意，最後我們願重復全國大會宣言中「民生主義之實行，當于抗戰期中求之」，及宋慶齡何香凝二先生所說：「不在空言，而在力行，不僅號召，而重實現」，以與我全國同胞共勉之。

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

陳翰笙

鴉片戰爭時，中國尚未進世界市場。到蘇彝士運河開鑿後，歐亞水運便當，中國之農產品漸漸出口而加入世界市場，不過營業數量到現在為止，仍只佔世界貿易的很小部份。這表現中國仍是經濟落後而未發展的國家。其理由是因為四萬萬人購買力低弱，市場表面上大而實際很小。從這點可以明白中國農村是十分窮乏，因為中國人口十分之八為農民。

在最近三十年內，代表全國經濟的主幹的農村，已很窮困，而且窮困的情形日益加深和擴大。約二十年前起，主要的農產米，小麥，麵粉，開始大批運進中國。經過近年大水災，食糧的進口更是增加。

今年和上年比較，雖收成並不壞，而今年米的進口，較去年增加幾乎一倍。又因為大批的農產品和其他五金料，煤油等的增加，今年一月到十月底止，我們全國進口的總量，雖僅一萬五千四百萬鎊，而進口的入超則等於進出口總額的一半。這樣看來，中國所謂「以農立國」的話，是搖動了。十五年前，章士釗先生提倡「以農立國」，曾引起一般人對於農工不偏重的爭論。但是十五年來的歷史已使「以農立國」的理論，失去基礎。

近代歷史上有政治獨立而經濟作附庸的國家。譬如十九世紀的美國和革命前的帝俄。但是從沒有見過政治不獨立的國家，能有經濟上的自由和發展的希望。沒有一個人能說非洲和亞洲各殖民地，它的經濟是真正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條件是在真的改好。歷史上的事實告訴我們，一般民生的改善，完全要靠對外政治的獨立，和對內政治的清明。對外的獨立就是抗戰的基本觀念。而國內政治的清明，亦即建國的根本觀念。

近三十年來，雖專制的帝制已廢，民主政治的門面是已有新型，但因為對內對外在政治上尚還沒有積極迅速的改善，所以一般的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只有崩潰的現象。要將我們三十年中國農村貧窮化的過程來分析一下，我們可從下述的五方面來觀察。

一、農產商品化的加速

上次歐洲大戰快終了時，我們的棉紗紡織業發展很快，所以我們的棉田擴張很多。先是工廠家的推動，後為（北伐後）官廳的積極提倡。所以華北華中棉田增加很快。因此米麥的種植面積，有相當的減少。這就是三十年以來農產商品化擴大的第一個現象。這現象對於農村經濟的影響甚大。最明顯的是一般農民依賴貨幣以收支。因為中國已經加入世界市場，所以這種商品化的影響比宋朝時我們中國農產商品化的程度高得多。對於農民來說，農產商品化的意義，即農民脫離自耕自食或自給自足的地位，而更依賴市場與貨幣。農民經濟獨立的地位，很快地損失和拋棄了。

農民如果有充分的耕地，有豐滿的收入，那麼農產就是商品化，農民的收入越多，而生活應當更好。但以中國的情形言之，則全得相反的結果。因為中國一般的農民，他的耕地是很小又很零碎，不能大量生產。因此各個農家生產品的量很少，沒有力量和商人議價。因此不能抵抗奸商的欺榨。在現有土地制度的情形下，中國的農產越是商品化，人民痛苦越利害。

近年來農產商品化的第二個顯著的現象，就是鴉片的種植。有一時期，政府表面上是禁煙實際上無形中迫得農民多種煙。因為煙田稅非常重，而收稅的官吏種種舞弊。不種煙的田，也要被每種稅

所以農民不得不種煙。如果種普通的作物，其收入更無法可以繳納捐稅。禁煙的結果，變成無形的推廣種煙。（有不少軍閥對不種鴉片的農民收餉捐）

抗戰以後，政府在西南產煙之地嚴厲執行剷除煙苗。但因為沒有替農民想辦法，使其可以改種其他作物，而同時能維持其原來的生活。因此許多農民破產。在滇西一帶，因不種煙而破產的農民，許多都跑到緬甸北部停苦力。這種現象，亦即證明在中國現有的土地制度下，農產商品化對於農民生活惡化的影響。

至於因為信用借款的關係，而增加桐油的輸出，因此桐油種植的面積，很快地增加。不但四川，湖南，即在浙西桂，也很快的推廣。據說一桶桐油可換兩桶煤油。這種商品化的農產，對於經濟作戰方面貢獻甚大。但因為統制價格的關係，桐油油的農民所能得到的收入，還不如他們所應得的價格。因此大批桐油的種植，和大批桐油的輸出，並未使生產農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二、純封建制漸歸消滅

農產商品化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早已使土地商品化。這種歷史從春秋時期起，一直到現在已有二千餘年光景。土地不買賣，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因素。自秦漢以來，土地可以買賣的區域，是漸漸擴大。也就是說純封建的逐漸破壞。直到現在只有西南偏僻的邊疆地方，因為少數民族保有他們民族利益的關係，故還有純封建的遺跡。

抗戰以來，工商業的資本遷移到西南，陷倒了少數民族的經濟勢力。或者利用軍隊的名義去圍地，或者用農業試驗場的名義去併吞少數民族公有的茶山，或者用救濟戰時難民或歸國華僑的名義，強制收買少數民族向來不出賣的土地。因為這些所謂抗戰建設的辦法很快的破壞了原始公社土地公有的制度。

在抗戰以前，二板制的一部份，可說是中國純粹封建存在的地方。然而因為農產商品化的關係，和抗戰以後外來經濟勢力的壓迫，純封建制也站不住了。四五年前，南寧，佛海，車里和思茅普洱一帶，情形

是不同的。思茅一帶早經丈量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而十二板制各縣土地歸村所有。此種村有不是閩粵山民所說的「村有」而是傳統原始公社式的村有。最近幾年變化很快。外來的商人和歸國的僑商現在已經借用公司的名義，通過縣政府的力量，收買土地。南寧，佛海已有這種情形。在不久的將來，車里也將逃過同樣的命運。

以車里來說，商業的影響和官廳的剝削，早已使純封建社會漸漸的變成一半封建的社會。除了像車里以外，全中國早已脫離純封建制。辛亥的春大，招商局的輪船載了買米從上海到天津。那是最末一次的買米，也可說是最末一次的純封建的田賦。民國成立以後，買米的制度剷除，封建賦稅的形式也就消滅了。現在的賦稅和兵差大部份是以錢幣的形式來征收。所以性質上雖是封建的，形式上已不是純封建的了。在純封建制度之下，沒有出錢僱人代替兵役的，而現在許多地方出二三百塊錢可以僱用一個壯丁代替兵役。

在純封建制下的農村，因為富於自給自足性的經濟，所以農民的生活程度雖不高，但生活因為有保障而很穩定。在半封建制的情形下，就大不同了。一方面忍受封建的剝削，另一方面又逃不了資本主義之剝削。這一種雙重的壓迫已經夠受了。又加上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地位。農民要改善他的生活起來反抗的時候，又因為外國的政治軍事的力量，更加適遇挫折。換句話說，現在農民的經濟地位，還不如在純封建制之下的經濟地位。

十四五年前北伐的時代，有些所謂革命理論家的，以為中國革命的基本隊伍是在佃農。所以當時他們以為粵湘鄂的革命力量，是建築在佃農身上的。這話固然是不錯。但這些理論家即因此而發出錯誤的議論，說華北因為佃農的成分太少，所以不能希望有革命的高潮。然而抗戰以來，這種錯誤已經很明顯的證明了。

華北許多的游擊區域，它的力量不是建築在革命的農民身上嗎？華北的自耕農，和華中華南的佃農，是一樣的貧窮，一樣的受壓迫。所以他們的革命情緒，是沒有兩樣的。在我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裏，地權集中了，耕地分散了，佃農和自耕農經濟的比較地位，沒有多

大分別。華北的一般自耕農，種三十畝以上的，是少數。因此也一樣很貧窮。北方自耕農和南方的佃戶，在經濟上既是同處低落的地位，他們對於革命的要求是沒有分別的。現在中國農民不論南北，多武裝的加入了民族革命戰爭，就表現了全國農民迫切的要脫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

二、高利貸制變本加厲

據政府最近發表的統計，十五省以內，一年以來，合作社的社數，由五萬三千餘增到八萬二千餘。社員的總數已達四百二十萬人。另有二萬六千非正式之合作社尚未算在內。目前估計我國合作社的社數，已有十二萬左右。社員的總數大約有五百萬人。至於生產的合作社，或工業合作社，約有二千餘合作社，因性質不同尚未會計入。

過去七年中，賑災會，農本局，建設廳，中央及各省府經濟委員會，南北各大銀行，一齊努力於農貸。農貸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信用合作社。按全國合作事業管理局的分析，本年五月十五日以前，所登記的各種合作社，有八萬餘。可是，全數中百分之八十八均屬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只佔百分之八。運輸合作社不到百分之二。其餘有如消費，公用，購買等合作社，只佔百分之十的光景。於此可知我國所謂合作運動，大部分實為農貸運動的別名。

目前農貸的制度，雖然擁有合作社的美名，實際確是集團的高利貸。表面上農貸的利率並不高。但通過土豪劣紳和原有高利貸者之手，實際利率，不能算低。好比都市裏的二房三房東，免不了把原有的房租增加了。並且信用合作社和原有的農貸制度，並不監督或直接幫助農民的生產。一方面便宜了農村從事於高利貸的分子。另一方面不啻是使農民得到一時的便利，並不能解除他們的痛苦。

怎樣便宜了農村高利貸的分子呢？普通的講來，二十年以前，一般人沒有聽到信用合作社的時候，高利貸者，只能利用他自己的資本來剝削農民。現在他們可以自己不出力，轉向信用合作社去利用農貸的制度。他們可以拿到一筆款，不是他人之愧，而倒是借公濟私赤手

來剝削農民。況且從前個人的名義出借款項，有時不容易收回借款。甚至難以索取利息。現在有了合作社的名義，還藉官廳保障，可以用更大的壓力，加之於欠債的農民。在個人高利貸窮於應付的時候，得到集團高利貸或變相高利貸的幫助，高利貸自然是更加猖獗了。

最近十餘年來因為農民的更加貧窮化，高利貸者利用這種情形，施借農具種子肥料等，甚至於借給食糧。到了收穫的時候，拿農產扣還，而又逼迫農民出賣這種農產。這樣變本加厲的高利貸，是混合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一起，而加重的多方面的剝削農民。所以農村中的生產關係一天一天的惡化，而生產方法無論如何不會有切實的進步。

有些政府的機關，名義上何嘗不是為經濟建設，何嘗不是為經濟作戰。但實際分析起來，不免有破壞經濟「與民作敵」的嫌疑。一方面大批的施用農貸，另一方面貶價的收買農產自桐油以至於米糧，比市價低了好幾倍。統制是應當的。但不應把它變成剝削的別名。許多商人屢次為「政府與民爭利」而呼籲。例如最近陳嘉庚先生對於閩省當局也有這樣的批評。如果中國大部份的農民能够像陳嘉庚先生一樣，的有批評能力，中國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至於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人們，假公濟私囤積居奇，操縱市場，暗中經營高利貸。雖然他們活動的範圍，都大半集中於都市，但影響所及，必然會到農村。所以金融的投機走私的勾當，和資金的外流，不斷的在那裏抽吸農村的血液，而加速的減低了農民的生產。

四、地權集中農民離散

辛亥革命時代，地主兼商人的，或軍人兼地主的，應比不上目前的這樣多。自從袁世凱死了以後，軍閥割據的局面越來越明顯。直到北伐以後，方才逐漸的消失。那十年中間，是軍閥最猖獗的時代。因為中國經濟的情形不允許迅速的工業化，軍閥們要徵來的財富，大部分是放在土地上。拿田租當作利息。於是大軍閥擁有大土地，東北數省大者數千頃。小軍閥有小土地，也是數千畝數百畝。現在廣東的南

時，雲南的滇南，江蘇的江北，綏遠，四川的全省，都是這樣情形。從前紳士式的地主，沒有武裝的能力備租運租。後來他們的土地只能轉讓給新興的地主，這些大半是軍閥們。他們既有力量，強制收租，他們的田產就更加容易擴大。因此這三十年來，後一個時期比前一個時期地權更加集中起來。

失地的農民，隨着地主的集中而增加起來。他們因為被租地主的田，不得不屈服於高額的日租。田租又隨着苛捐什稅增加。佃戶因為不能應付不斷增加的田租而淪為僱農。但又因為農場經營面積的狹小，被僱的人數不多。所以破產的農民，大批的離村。十年以前直魯豫三省的農民，轉移到東北去的，每年達一百萬。自第一次歐戰，直到世界經濟恐慌開始，閩粵等省，破產的農民也成千成萬的流亡到南洋一帶。當苦力。許多沒有出路無法遷移的破產者，不當地匪便投入軍隊。他們在軍閥制度之下，漸漸失去了農民本來的面目而同化於流氓性質的游民。因此造成中國軍隊的備種性質。

這種備種性質的軍隊在抗戰過程中，已都被消滅了。然而過去的三十年中，他們便是軍閥的工具，內戰的炮灰。軍閥們利用他們來括削，或造成括削的地盤。南北都是一樣。括削來的財富，大部份投於地權裏面。於是地權的集中，更進一步的製造離村的農民。這些人便又變成後補的軍閥利用品。因此軍閥制度，地權集中，和備種式軍隊，打成一片而成為中國數十年間經濟崩潰的最大因素。以前農村原是生產的淵藪，後來變成流氓的淵藪了。

抗戰以來，因為軍隊性質的改換，軍人愛國心的煥發，而事實上也不允許軍閥制度的暫戀，因此，一般入甚至軍人比文人更愛國。目前愛國熱的文人似乎多於軍人。而現在軍費不投放在土地上的也是一些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投機而走私者。所以地權的集中者，又已轉換性質了。

國，粵，兩省尚有不同的原因。這裏沿海幾縣，及韓江上游梅縣等地華僑素多的區域，抗戰以後，地權更加集中。大部分的原因是由於華僑匯款不敢長久存放在銀行，而必須收買土地，以變為永遠的資

產。華僑匯款向來是促進地價，而加速地權集中的一個因素，可是因為目前的狀況，這種匯款更轉變為買田的資金。

五、勞力銳減熟荒驟增

辛亥以後，中國屢次向外國接受大借款。而因關稅的抵押，貿易上的稅則和條件往往對於進口貨予以特別便利，大批的洋貨遂繼斷的打擊手工業。這個影響，對於農村是很大的。一方面洋貨壓倒土貨以後，農村中靠手工業來過活的，逐漸失業了。另一方面，許多靠手工業為副業的農民也不能維持生活了。農村中勞力當然因此而減少。

同時，地權雖然集中，因為地主要出租而不經營。出租的田地，既零碎又分散。農場的經營過於細小，佃戶或富農也不能多僱農工。在這種情形之下，地權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縮小。經營面積也很少能擴大。所以勞力的應用益難，而被僱用的農民愈是減少。

又因田賦和苛捐什稅的增加，在內戰時加上兵差勒索。有些地方更擴土匪的焚劫。耕地一批一批的成了熟荒。這在雷州半島就很明顯。熟荒增加是農業生產驟減的最清楚的一個索引。

抗戰期中，因為許多地方兵役實施的不得法，不管有用或無用的，有業或無業的人民一概用兵差的舊法，使他們入伍。這對於農場的勞力，也有很大的影響。許多農民應當免去兵役的，常常因為害怕沒有保障而逃避兵役。（他們中間很多從事私販，或其他不生產的工作），因此農民的勞力銳減。這個現象反映在僱農工資的驟增。山東各縣壯丁逃避兵役的很多。僱農的工資在兩年前，只是二十六到四十元。去年也只是四十至八十元。而今年却非一百元以上不能僱到長工。長工的工資並不包括飯食。所以米價的驟增對此項工資的增加到底有多少關係。許多地方因為兵校關係而勞力減少。這是熟荒擴大的一個主要原因。熟荒尚且增加，當然談不到切實的去辦墾殖，因為目前很多大的墾殖公司所遇到最困難的問題，也是找不到人工的問題。

x x x x x

我們民族的經濟獨立和自由發展，固然要依靠政治能夠獨立。然而要爭取對外政治獨立地位，達到抗戰勝利目的，又非在建設方面多下工夫不可。正確的政策和正軌的行政，必是抗建大業先決的條件。也是解決民生，實行三民主義的前提。有人說，目前中國的情形，政治不如軍事，經濟不如政治。其實這三方面是不能分割的。如要分別而論，亦可說軍事和經濟都須依賴政治。

游擊區發展得好的地方，就已證明這一點。那里的農村已經不在土豪劣紳統治之下了。就因為民衆已經動員，民衆已經武裝，民衆有自衛自治的能力，政權在他們手裏。他們才有改良他們自己生活的資本。在這些地方雖然經濟的發展，似乎趕不上政治，以後在一面抗戰，一面建設中，農村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是很有希望的。

國父三大經濟政策

謹按 總理遺教關於經濟政策之重大指示，約有數點：(一)為貨幣政策，即吾人數年來施行之法幣政策，(二)為糧食政策，即主張糧食不備須由政府澈底管理，且應實行公賣，(三)為土地政策，即主張平均地權，而其實行方法，則由初步之土地報價，進而至於實行地價稅與照價收買，更進而至於最後之土地國有。我國為以農立國之國家，欲澈底解決抗戰建國之財政經濟問題，自非充分注意土地問題，貫徹總理之土地政策不為功。總之，目前欲使糧食及一般物品之價格得其平，欲使國家財政問題之歲出入得其平，必須於法幣政策以外，更進一步從事於大規模之開源，而開源之方法，即在澈底的普遍的管地權，甚或實施糧食公賣，並澈底執行平均地權之政策，則土地之收益，即為國家之收益，而糧食既非私人可以操縱營利之商品，一方可由公賣，以平抑糧價，一方以其公賣之所得，又可為國家一切事業之最大來源，在抗戰建國之現階段，吾人必須發揮革命黨之精神，根據總理遺教，從農業方面，從土地方面，執行以利於國計民生之經濟政策。

(重要更正) 本刊七卷二期二七頁第五行：「邊鈔是不能在游擊區購買東西，『游擊區』三字係「敵佔區」之誤。

歐戰帶來的農業恐慌

恐慌的一般姿態

從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結束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這二十多年中間，資本主義各國的農業恐慌始終如魔鬼似的陰魂不散地伴隨着整個世界經濟恐慌而出現。祇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及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幾年間，恐慌的程度比較弱一些。可是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新的經濟恐慌又逼美國爆發，很快就波及到農業部門。直到去年九月第二次大戰爆發，美國的農產品（例如小麥）價格還是停留在一個很低的水準上。歐戰不但沒有力量消滅那個週期性的農業危機，却在歐洲的大陸上帶來了新的農業恐慌，帶來了饑饉和農業生產的極度破壞。

根據最近國際經濟研究機關的報道，有幾件事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 (1) 在整個歐洲，一九四〇年穀物收穫較一九三九年減少將近一〇〇萬噸特勒。(註)
- (2) 又據另一估計，今年歐洲需要小麥四千三百萬噸，生產量不過三千四百萬噸。
- (3) 多瑙河流域各國，今年小麥收成減少百分之四〇。
- (4) 法國穀物收成，僅及往年百分之五〇。
- (5) 比利時的牲畜，減少了百分之五〇。
- (6) 丹麥的豬由三二〇萬頭減至二七四萬頭。
- (7) 其他如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國，正受食物缺乏之嚴重恐慌。

(註) 森特勒 (Cental) 為歐洲衡制單位，每森特勒等於五十三公斤。

張西超

至於一切歐洲國家農產的收穫量的具體數字，沒有可靠的記載，而且這一類的數字，歐戰以後各國都祕而不宣，恐怕在這次大戰沒結束以前，它們是不會公佈的。在這裏，只能隨便舉些例子：

(1) 羅馬國際農業研究所會公佈了下列的統計：

各國小麥收穫量 (單位一萬公斤)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羅馬尼亞	一九三九年 四四·九	一九四〇年 二九·九
匈牙利	三〇·七	二二·八
意大利	八〇·〇	七三·〇

一九四〇年的收穫顯然是減少的。

(2) 在七月底，瑞典方面曾有一個報道：「倘從收到的收穫報告看，由於長期的旱荒，預期將有一個很大的歉收，甚至許多人還要擔心到收成全無。」

(3) 在瑞士，在保加利，在匈牙利，都是歉收的年份。

(4) 法國的收穫量要算最不景氣。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所播種的冬季小麥，祇及上年的半。就從這個事實，可以測知它收穫量是為什麼要減少了。

在歐洲的大陸上，雖然由於戰爭的關係，農業生產衰退，農產歉收，普遍的形成了饑饉的恐慌；但是在地球的另一面——美洲，却有大量的農產品過剩，而找不到它的市場，特別是南美洲各國。在阿根廷，曾將六百萬噸過剩的玉米，運到工廠或鐵道方面，當作燃料燒毀。在巴西，今年政府至少向農民購進七百萬袋咖啡，用毀滅的辦法「使它們跳出商業的圈子」。而沒有咖啡吃的歐洲人，只好「睡在三尺」！甚至在歐洲鄰近的北非洲，也因為英國海上的封鎖政策，以前從摩洛哥輸往法國的農產品，現在也因「此路不通」而失去市場。

場。
在歐洲，農產品價格飛躍地上漲，但是在美洲，依然是低落和狂跌！這說明由於戰爭，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性和內在的矛盾，愈益暴露無遺了。

恐慌由誰造成？

帝國主義戰爭是一種破壞的戰爭，它將使人類陷入長期的悲慘的命運途中，它直接毀掉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所以它又是一種倒退的戰爭。而戰爭的消耗，都是由各國的生產大衆來負擔的。據研究世界經濟的權威學者瓦爾加氏的估計，在現代的戰爭上，要使一位士兵在戰場作戰，就需要有六個到十個勞動者在後方來支持他。所以，戰時勞動力的缺乏，影響到農業生產的減退，是同等重要的原因。在德國，英國，特別是法國，由於戰爭的關係，人力的缺乏是目前農業上最困難的問題。在法國，就是在沒有戰爭的平時，它在農業上已經時常感到勞動力的缺乏了，在戰時自然問題更嚴重。我們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農業的收入只抵平時的一半，因此法國政府不得不允許已經入伍的農民在農忙時准予請假回家種田，以避免農村經濟的破產。

在德國，目前最雇用了大批的波蘭人，比利時人以及其他戰爭中的俘虜，這是從波希米亞和摩羅維亞輸入工人，來救濟農業勞動的缺少。同時，一到假期，學生們都被迫到田間去工作。

此外，馬匹和車輛的被徵用，汽油的缺乏，（使農業上曳引機的使用受到限制）人造肥料的不足，都是使歐洲各國農產歉收的重要原因。一般資產階級的報紙上，都將今年底歉收歸於惡劣的氣候，說是因為野寒夏季以及大旱所致。它們忘記惡劣的氣候如果沒有戰爭的威脅，尚可以人力來挽救，而今年歐洲之所以歉收，而成糧食的普遍恐慌，實在不能不歸咎於少數野心政治家所發動的戰爭，摧毀了農村的生產力！

其次，海外糧食之停止進口，也是造成歐洲饑饉的重要因素。原

來，從整個歐洲來說，食糧和飼料的需要是很難自給的。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間，歐洲平均每年輸入穀物在九七一萬噸以上，而自給量祇有三六五萬噸。今年歐洲雖然歉收，自然更難從海外輸入穀物了。但是大戰以後，海外糧食的進口幾乎已經停止，這就不得不加深了歐洲饑饉和恐慌的程度。下面一段新聞可以幫助我們對於這一點的了解：

「……由於船隻的停止出海，使出口商受了極大的影響。……英法的船隻只能不定期地航行，德國的船隻則停留在港口裏，……意大利船隻曾經有一時期是停航過的，就是挪威的和荷蘭的船隻，也是最後開始停航了。」（南美洲一個報紙的記載）

因此，南美洲有許多過剩的農產品便無法運銷到歐洲大陸去解救它們的饑饉。

再其次，軍事行動對於糧食的直接損壞，乃更是不言而喻的。據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我們也可想像得之。例如機械化部隊底行動，摧毀了生長着的穀物；勞動者被迫服兵役或大批難民的流亡，減少了收穫的數量；轟炸引起了大火；洪水泛濫着大地（荷蘭）；運輸糧食的船隻，不斷被擊沉沒，在海港，在大車站，或者在製造的工廠裏，倉庫也常遭到空軍的炸燬。這種種，構成了食糧損失和加深食糧恐慌程度的又一重要因素。

至於在侵略者的德國，早在大戰以前，就已經毀發大批的耕種土地作為軍用，如建築飛機場，公路，和防禦工事等等。據「新世界論」週刊上指出，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年的耕面積，比一九三二年縮小了一、二八二、〇〇〇公頃（每頃的合六十市畝），等於德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四、五。這說明納粹國家在發動侵略的過程中，就種下了製造農業恐慌的種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今天這些種子都在納粹國家裏發榮滋蔓了。

恐慌的轉嫁

少數納稅者對國家製成的稅額所引起的農家恐慌，其重且並沒有於在他們的肩，而必然的轉嫁到納稅國家以及被佔領小國的農民生產大家身上。

希特勒的門徒在戰前早就叫出「以大砲代替牛油」的口號，德國的人民早已縮緊了褲帶。現在恐怕是縮無可縮了。「新世界論壇」指出：「軍事防禦工程吞併了土地，農民的逃走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特別從居民稀少的區域逃得厲害」。目前，德國邊境的農業區域，簡直有無人居住的現象。因此，該刊指出這些現象完全推翻了納粹統治關於德國人民的「生存空間不夠」的傳說。該刊這樣發問道：「人民沒有空間嗎？不是的！人民是從有廣大土地的空間逃走了，因為他不能在那裏生活。已經把他的良田吞去了，在這些田地上建造飛機場，軍事工廠與兵工廠；只保衛大地主的利益，而不以他們的土地來擴大人民的「生存空間」，由此可見所謂「沒有空間的人民」的傳說，不是別的，正是一種危險的武斷宣傳」。

其次，納粹德國為了支持長期的侵略戰爭，就不得不強迫在五十萬餘方哩佔領地上的一億七十七萬人民，與德國人民踏上同樣的命運。

先看波蘭

波蘭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國，去年德軍佔領波蘭以後，為了「開發」波蘭，德國的鐵道隊及勞動服務隊飛速的趕到，和工兵隊協力，把當了四戰年而破壞的道路，橋樑，鐵道的修理工作。強迫投降的波蘭兵士，從事於整理菜園，飼養畜等農村恢復工作。到了今年，德國更頒布了七十萬公頃耕地改良的四年計劃，以努力農產品的增產。現在正集中注意於馬鈴薯，亞麻，植物油等的增加收穫。而且規定：要是收穫額不到一定數量，就要依法科以罰金。因此波蘭的農民負有一種義務，必須供給德國以穀物，蔬菜等總收穫量的八成。這就是納粹德國將農業恐慌的重擔轉嫁於人的典型例子。因此，波蘭自從被德軍蹂躪後，土地荒廢，農產衰退，耕馬和家畜數量激減，物價狂漲

，雖然實行了憑券購買制，並不能保證其糧食的不缺乏。麵包其前年已貴了十八倍，馬鈴薯貴了二十倍。雖有百萬人以上送往德國，可是一般國民的生活依然陷於悲慘窮困的境地。

其次看荷蘭

「荷蘭佔領以後，在市場底閉關上，立刻做了一樁模範的工作，雖則橋梁和鐵道都被損壞，可是，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不但已把荷蘭一向輸往德國的農產品底市場恢復起來，並且還把荷蘭從前輸給敵國的貨物，一齊運到德國。在現在這幾個星期中，每天總有一百輛火車以上的菜蔬從荷蘭運到德國去」。(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柏林交易所日報)

因此，現在荷蘭人民和德國人民一樣，有着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在荷蘭，麵包和麥粉已經實行計口授糧制度，每人每週限購二公斤麵包。「淨白麥粉本是荷蘭底主要消費品，現在是將被沒收了。因為小麥要碾得粗一些，並要把黑麥粉和馬鈴薯混在裏面」。

在荷蘭，雖然有德國「賜」予「照顧」，設立了國家補助委員會，使失業業者從事於荒廢了的土地之再建或送往德國去，藉以解決失業問題；但是，今天依然有三十萬失業者在荷蘭國土上等待着。

在比利時

至於在比利時，失業問題的嚴重不會比荷蘭減輕。戰爭恢復工作在急迫進行，失業業者依然是一大批地出現。為了農業的「開發」，比利時的俘虜和失業農民也會被德國強迫了參加勞動。在比利時，也有着食物消費的嚴格限制。成年人是不准吃牛奶的，同時小壯牛的家畜也是被禁止的，乳牛的數量必要時還要加以減少，總之，在長期中不允許牛奶的數量增加，為的是節省飼料，減低糧食恐慌的程度。

法國自從向德國屈服以後，在農村經濟上也不得不被納粹德國統制着。由於貨幣兌換比率的懸殊，(一馬克等於二十法郎)法國的農產品不斷地流入德國，法國本來是糧食不足的国家，至此，法國農民格外顯得饑饉威脅的嚴重了。

因為農產品收穫的減少，戰爭消耗的浩繁，歐洲一般國家都實施了糧食嚴格統制。但是，不管糧食統制如何嚴密，地主富農甚至中農們總有方法借助於自己耕種的農產品，來使他們底日常生活得優裕一些。住在城市裏的富有者，更可買到非統制的食品，如魚類，野味，家畜，蔬菜，鮮果之類，（雖然價錢貴一些）以補計口投糧食品之不足。所以，一般說來，富有者們就是在戰時也永遠不會陷於饑餓的

。饑饉與貧困，無論在何時何地，是永遠跟隨着貧苦的農民大眾以及一般勞動人民的。「他們雖然能領到計口投糧的分配券，而不能得到在券上所表明的一定份量；甚至他們底收入太低，實在無法去購買所有的計口投糧的物品。」（瓦爾加：歐洲在饑饉中）這告訴我們：帝國主義戰爭決不會被勞動大眾所歡迎，所歡迎！

俄文讀本

賀青先生編著

▲新知書店發行▲

這是賀先生精心編者的俄文教科書，一書有四本，這一冊共四十課。先生讀物，從短句發展到短文，接着根據讀物的內容講文法，對生字的讀立。和意義的註解，都很扼要，最後是練習，選擇生字很用工夫，都選常用的字彙，它們的出現，都很有次序，應用的機會也很平均，翻來覆去，使讀者不必死記就可熟習這些生字，內容都適合中國讀者，文法先是跟着課文走的初步文法，然後再作有系統的詳解。此書編竣後，曾經蘇聯友人校閱一遍，態度鄭重，斷費心血，堪稱為國內最佳的俄文讀本，它將以讀者的學習證明其優秀的一本教本。

▲第一冊▲

▲上紙本二元五角▲

▲報紙本五元▲

農業工作者往那裏去？

項德崇

一、翻翻舊賬

農——一向是被人瞧不起的。在咱們中國，父兄送子弟讀書，期望的總是能做高官得厚祿，花了洋錢去學種田，不是傻瓜才真是怪事。然而時代究竟不同了，青年人眼看著這老大的國家一天天衰下去，農村破產又是一天天的深刻，終於不顧一切的談諧恥笑，走進這個農業的圈子裏來，抱着滿腔熱忱，奮發無窮，以為祇有用科學方法才能發展農業，富裕農民，然後國家才能興盛。然而農業界幾十年的努力，却並沒有使自已期望的實現，相反的國家和民眾且一天天走向更悲慘的境地。

為什麼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之農業反不發達呢？為什麼這古老的農業，經了無數青年幾十年的奮鬥，還不能改造這落後的生產方式呢？

對於前者，有的人把農業的不發達完全歸於農業科學工作者的不能吃苦耐勞。有的人說，在落後的社會經濟條件裏，要想一下子跳到近代化的路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祇要大家努力社會改革運動，等到某一新社會到了時，農業的發達是不成問題的。

也有是說中國農民文化水準太低，愛迷信保守，不知甚至是不肯接受新科學。

更有說是中國工業不發達，所以農業也就沒有前途。

這些說法，顯然是片面的狹窄的，過去農業工作者固然有不能吃苦耐勞的人存在，但不能一概抹煞，說一個刻苦的工作者也沒有；中國社會經濟落後，固然不能完全依賴主觀的努力使中國一下子近代化，但說農業工作可以放下無需做，等到某一社會到來時農業也自然會跟着變動，事實上他却是一種等待主義。當然，我們并不反對參加社

會的改革運動，而且，根本上在任何作羣範圍裏的人，都是離不開這一前提的，因此，農業工作者不能放棄本位工作，而另找社會改革的去向，實在是很明顯的道理。

至於說農民文化水準低落，不肯接受新科學，也祇是片面的道理，「農民文化水準為什麼會低落的呢？」這不是因為生產方式落後？當抗戰局勢最艱苦的今天，當這一新形勢要求着一切工作者負起新任務來的今天，當着農業工作者需要深入農村動員農民抗戰增加農業生產，這一偉大任務提到實踐的日程表上來的今天，對農業科學工作者提出檢討，並決定今後實踐努力的方向，實在比今天非常必要而且急待解決的課題。

在這裏，我們閉閉眼睜來一看，認為農業不能發展，根本上是因為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就是說，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枷鎖沒有打斷以前，一切的努力如社會改革運動和科學的提倡，如果撇開這一前提，從某一工作的小天地裏去找出路，其沒有前途，沒有出路，實在是毫無足怪的事。

但，我們把一切的罪孽委之於社會嗎？這又不然，在農業推進的過程中，農業工作者主觀上錯誤，因而不能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甚至至於引起相反的結果，也是不能躲其咎的。

錯誤在那裏呢？

第一是實踐的方向沒有從基本問題出發，沒有從中國社會的特質——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個基點上出發，却以為中國衰弱是由於無知識不科學，甚至說國民體格不強。因此幾十年的努力就完全落在孤立的農業改良上，他們以為祇要科學發達，農業就可發展，農村就可以繁榮，那麼這個農民人口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國家，絕大多數的民眾購買力提高經濟富裕，國家豈會不強盛嗎？帝國主義還敢欺侮咱們

嗎！

第二，既然認定「科學萬能」有了它，可以醫治國家的衰弱症，因此就和現實社會隔開來。在過去，幾乎所有的農業科學者都會有過「清高」的想頭，以為祇有自己的工作才是有意義的工作，其他什麼政治，經濟，民衆運動社會革命，都是大砲。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試驗室裏，離開了實際，結果農業就成了孤立的懸空的东西。當你在試驗室研究什麼，還沒有研究出來時，敵人已經打進來了，農村被洗劫，農民被殺戮，更精的是科學館和學院成了敵人訓練的兵營俱樂部。

還有第三，單以農業本身的研究來說，也還是很不夠的，那就是祇注重書本而忽略了實踐，祇看到了學校農場沒有看到農村社會，因此書本子是愈得愈多，外國名詞也讀得很多，可是碰到一些實際的問題反無法解答。比方你問他發生雞瘟牛瘟時怎麼辦，他又可以說出一大套打針的道理和外國藥名。農民們呢，心裏想那是外國法子我們學不來的，於是雞瘟死了，牛也瘟死了。

這就是死讀書本子的結果，不去理解農村當前的狀況，農民接受的程度，不顧到今天中國農村經濟情形，所學不能用於實際問題中，這是多麼可痛心的事啊！

我們祇要平心靜氣的思想，農業在中國，幾十年的歷史，雖然不能完全抹煞其成績，而且主觀上還是爲了對國家民族盡其偉大的孝心，但由於上述的事實，我們却實在不能對此感到滿足，并覺得糊塗太多，花下去的力量大，而賺回來的太少。

二、今天又怎樣呢？

在這樣一個驚濤駭浪的時代裏，大部份的農業工作者還沒有甦醒，仍舊做着「農業救國」的美夢，這當中甚至有一部份人墮落到販賣經商，辦小農場忘記了國家民族。但同時，有一部分農業工作者，今天終究在時代裏走上光明的大道，真正以新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姿態出現，爲抗戰建國的事業艱苦鬥爭着。

第一種人，他們仍舊死死抱着那一套「農業救國」的理論，這種人在今天可說是佔了絕大多數，佔據着每一農業科學工作的崗位。他們主觀上仍舊是爲了「農業」，爲了「救國」，而且還相當勤謹的工作着，可是，由於觀念的模糊實踐的錯誤，已經大大地與現實的抗戰事實脫節了。他們一直到現在還認爲農業是國家的根本，祇有農業的發展，國家才有希望，因而對當前政治形勢不能有有機的結合起來，迴避政治問題，到農村裏不願與基層行政和合作人員配合，孤立地去「發展」農業，藐視政治動員工作，即在同事之間，也是各管各的，從來聽不到有什麼問題研究，互相幫助學習，除了本身有這些弱點之外，有時還妨礙着進步的農業工作者。

第二種人是由於工作接近了大衆，現實，同時又受到抗戰時代激烈的影響，農業工作在過去那種作風下無法開展，因而發生極大的苦悶，既而又在苦悶中漸漸走出一條道路，知道農業工作在在與整個社會環境有着極密切的關係，再不能作孤立的看法，最顯著的兩個表現是：

1. 開始對社會科學等理論的學習加強，知道「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

2. 開始接近現實，深入鄉村，不惟是做農業純技術工作，而且能與民衆動員工作，改善民衆生活等有有機的配合起來。

這一部份人，毫無疑義的是最進步最能發揮工作的，然而在所有農業工作者羣中却祇佔着極少的數目，這極少數的進步份子在今天却表現了幾個特點：

首先是這些人都有了相當的政治認識，工作向裏層推進了一步，每種工作都有了一個理論（雖然是不完整的）不再是閉着眼睛瞎碰，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各地發動組織農會，把農會當作農民運動團結農民的核心，把農業生產工作也視爲動員工作之一，這毫無疑義的，已經使工作得到新的較大的效果了。

其次，都具備了刻苦樸素的作風，丟棄了過去說大話而不會等毛病，由接近民衆而同情民衆而幫助民衆解決困難，因此農業工作也

較易獲得開展。

再次是因剛走上新的方向，熱情多而理智少，實踐多而理論不夠，因此工作的表現上，就不免過左，過於激烈，形成工作者羣中凸出的人物，因而工作必然要受到嚴重的打擊，這種打擊給一個初出茅廬不「駭」不「韌」的人，確是十分嚴重的。

在打擊之後能再堅持下去的，雖不能說沒有，但却是極少數，在這裏，被打擊者的出路，就祇有兩條：

一是安分守己拿拿薪水，過一天是一天，完全陷入了宿命的圈子裏去。而且還可能走到更墮落的路上去。

一是乾脆不幹，再重彈老調子，認為政治不弄好，農業工作總是人家的尾巴，所以就拋下工作，向政治上發展，這一現象幾乎普遍到任何一地的進步工作者身上，認為這是被打擊後唯一正確的路。

第三種人是我們認為最可鄙最無恥而根本不是如在工作者的立場上的，他們不但不能和進步份子站在一起，而且連「為農業而農業」那種精神都不能保有，這種人所以還站在農業這一崗位上，實在是因為「官運」「不通」，而不是對這工作有什麼留戀，所以不得不依賴着農家而苟活下去，（自然還不會忘記怎樣「向上」爬）於是在這裏頭表現的一是對工作不關心；二是自己辦小農場收販貨物，在機關裏同工間打小算盤，盤算怎樣在物質的享受上不比別人吃虧；三是為了怕人家說他腐化，因此就一方面拉所謂第一種人下水，一方面在保守與進步者之間不惜挑撥離間，并向進步的攻擊中傷，終至使進步的離開，或是大家顯得一樣（腐化）。

三、以後怎麼辦

第一，應該增強自己的認識，繼續學習正確的理論，為了使科學不變成教人的東西，不使自己實踐的方向迷惘，不使自己的工作和現實脫節，我們就祇有增強自己的認識把握住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第二，應該面向現實接近大眾，把理論實踐統一起來，過去的農業工作者，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實驗室農場裏，忘記了農村社會和廣

大眾，因而各種新的科學成果，無不使民衆接受，空礙了工作的進展。我們今後必得面向現實，和整個社會的客觀條件配合起來，深入農村，接近羣衆，使自己的理論能引導實踐的方向，并使理論受到實踐的洗鍊，這樣把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在建設新農業新中國的途程上，必可增加我們戰鬥的實力，縮短遙遠的路途，加速勝利的到來。

第三，應該將農業科學成爲中國的東西，不要將西洋科學生吞活剝的搬到老百姓面前，硬叫民衆接受，我們應該將外國進步的科學同自己過去的遺產把它經過揚棄，然後再製造一番，使它成爲中國化的東西，而爲民衆所樂於接受。

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不同，由於地理氣候的各異，由於大眾文化水準的落後，由於中國人特有的習俗和氣派，你是不能仿照外國人的作法的。「科學總好的」這句話原不算錯，但科學能否爲大眾接受又是一回事，這正如中國農業工作者除了研究農業之外，還需要農業推廣，講求推廣的方法使農民樂於接受，你說：

「這是有加利樹，在澳洲直徑可以長到一二丈寬，高可長到三四十丈，老百姓種了一定包管發財」可是，在中國種了幾十年的試驗是廣東種的直徑祇能長尺把，廣西長幾寸，湖南更小在南京就根本不能活了。

第四，應該注意自己工作的作風，在今天，我們固然反對「蘇而不實」，「訂大計劃不做事」，「吹牛」等毛病，但也同樣應該反對過激和「英雄主義」的作風。

首先我們尤其是一部份進步的人應該認清因過激而引起工作上的阻礙是有害的行動，決不應因急功而走上痛快路，結果亦但不能痛快，而且會招來大的苦悶，以至離開工作崗位，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能持久，能刻苦，能沉着，能堅也能韌，能進也能退的戰士。

其次我們反對逃避主義，用逃避來解決苦悶，決不是解決苦悶的方法，我們應該認定困難和挫折是工作中免不了的過程，尤其是一向就落後的農業工作，一下子想升堂入室是不可能的，祇要能走到目的地拐拐彎子是沒有關係的，在抗戰形勢如此艱苦的今天，我們有理由

要求逃離的回來（但不是回來為農業而農業），應該堅持自己的工作崗位，因為農業工作是抗建工作中重要的一個環節，過去我們說農業沒有出路還可以，但在今天，束縛全民族自由的鎖鏈快要打斷了，而農業也將展開光輝美麗無限的前途，我們正該鼓起勇氣，努力奮發，向前邁進呵！

再次，要着於爭取并領導保守份子，上面說過，在我們農業工作崗位上，保守的份子是有可能走到進步的路上來的，同時他們主觀上也還是為了工作，因此我們如何爭取他們站在一起增厚工作的力量，實在有新絕大的意義，那麼我們就不能自命進步而獨得特殊，和人家革革不入，應多從工作努力的表現上，待人和藹可親上，慢慢使人和我們接近起來，并加上說服的工作，這樣來教育自己和教育別人，毫

無疑問，勝利將屬於這種努力的人，至於對待落後份子，我們也還是不能放棄的，祇要他不是漢奸，在今天，我們對他都不應取着敵視的態度，而盡量爭取他脫服他。

最後，我們應該團結自己的力量為抗建事業為新中國的建立而奮鬥，這裏最重要的一個契機，就是一定要使農業工作配合着各種動員工作來做，因此我們就得加強民衆的組織如農會合作社；就得協助政府改善人民生活如實行新地租條例，二五減租；就得設法增加戰時生產。幫助農民解決肥料，種子器具等問題。總之，要使農業工作和今天的政治環境不脫節，而是處處配合新形勢，使農業工作在新中國艱難縮縮過程中，如前線戰士一樣發揮偉大的戰鬥力量。

編後記

本期的出版，剛在民國三十年的新年。雖然本期的年齡，只及中華民國的五分之一；但是欣逢大哥哥三十歲生日的時候，我們這個小兄弟自然應該來熱烈祝賀一番。所以本期除請千家駒先生代表本社「迎接民國三十年」外，還承陳翰笙先生賜給我們：「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一文。陳先生十餘年來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上的供獻，當為一般讀者所深知。本文綜合三十年來中國農村的變化，指出幾個顯著的趨向，自然值得讀者細細體味。

「戰時農村經濟講座」是第七卷一期起連續登載的。過去已發表過的有「怎樣研究戰時農村經濟？」（千家駒）、「游擊區的農村經濟」（張錫昌），下期我們預定的是請姜君辰先生講「大後方的農村經濟」。本期姜御方先生的「淪陷區的農村經濟」一講，請讀者特別予以注意。（昌）

中國農民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朱智賢

給農村教育工作者

一、從何說起

當我寫着「中國農民」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的面前映着無數的憔悴的臉，那臉上泛溢着一種無言的悲哀。他們已失去辨認的能力，對於那長期的勞苦的重負與慘慘的遭遇。不久以前，也有人給過他們以廉價的溫情，但又有什麼用呢？那些「哲學家」「洋博士」們的好意的幻想，也許會有一時的「安眠」作用，但幻想一碰着現實，便只有跌得粉碎。現實的問題已經逼到頭上，不容我們再徬徨瞻顧。遙邈未來，我們是不能再欺騙自己，是不容再賣弄玄虛，現在已不是向少數人討好的時候，我帶着一顆沉重的心，願意來坦率的向世人揭發。

據說，遠在若干年以前，我們的祖宗，一同勞動，一同享受，誰也不知道討誰的便宜。但是以後漸漸變了，像唱戲一樣，以前是大家平起平坐，後來却有的人唱主角，有的人便永遠打小旗跑龍套了。這是我們祖宗所夢想不到的。他們的子孫會那麼愚昧的扮演出各色各樣的古怪的悲劇。

自從生產方法發展到以奴隸為主為主角，奴隸們打小旗跑龍套的時候起，一切情形都變了，政治，道德法律，哲學藝術等等，都塗上了新的顏色，作為上述觀念形態之傳遞手段的教育，也跟着變了質。以後，地主代替了奴隸，打小旗跑龍套的換成了農奴，角色的裝扮雖然不同，但關係總是一樣，這樣一個場面，在中國演出了漫長漫長的時間。我現在要說的就是這個場面裏打小旗的一羣所受到的教育的畸形，用官板正字寫出來，就是：中國農民的教育問題。

二、不堪回首

根據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我們知道，以地主為主角，以農民為配角的舞台面，是始於周代，此後繼續表演，直至清末。這其間，扮裝地主的，也會換過幾次騎臉，兩周的時候是不折不扣的貴族地主，春秋戰國而後，他們却帶上了濃厚的商人氣，這些主角，有時是由劇團中人自己扮演，有時則由外來的角色客串一番，成吉斯汗和愛新覺羅都會唱得有聲有色。主角之外，當然是打小旗的一伙了，但這是兩周時代的唱法。戰國秦漢而後，劇中就複雜起來，除了主角與打小旗的之外，還有幫閒的一伙，在一人（君王）之下，萬人（農民）之上，作威作福，這些人專做吸吸臉，眉着前靜避避的招牌，擔任唱道開路的工作，他們有時也向打小旗的人們遞個眼色裝着好意的樣子低聲的說：你們可別亂動，亂動是要吃虧的。到了清末，洋人來了，把舞台弄得稀糟，主角和幫閒們也曾慌了一陣，但定睛一看，洋大人並不是活冤家，死對頭，大家可以合演，於是洋人也參加做了主角，有時出場，有時却在幕後，原來的主角，只要留神洋人的眼色，便仍舊可以表演下去，幫閒與打小旗的，雖然跑了一些，變成對頭，但那仍然無礙於這戲劇的演出。不過這舞台上的「秩序」却越來越不好了，打小旗的一伙，總想恢復平起平坐的場面，幫閒的也有些整成了幫忙。這就是現在。

我們的祖宗，遠在平起平坐的時候，他們教養他們的孩子，只是任生活要隨時指點一下，後來，一來人事太繁了，二來舞台的場面不

同了，教養的方法也隨時發生變化：第一，主角們把教養的手段拿在自己手裏，隨着自己的意思來講一些道理，大意是說：你們是天生賤貨，命該如此，我們奉天之命來管教你們，你們應該服從，應該感激。這在書上，到處都有寫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你們看，這還錯嗎？第二，但是那些醜態的角色們，偏偏不聽話，因此惹得夫子大發脾氣，不勝其感慨的說：「推女子與小人（農民）為難養也」。怎麼辦呢？主角和幫閒者商量了一番之後，大家同意：最好把他們的眼睛封起來，免得出亂子。夫子想首先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口號。據說俄國沙皇時代也會有過夫子的同志，不過說法不同，那是一個教育部長之類的人物，他說，教育同鹽一樣，給農民吃得太多了，會出毛病。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第三，大多數人是可以封上眼睛，安然無事（？）的，但也有些不安分（？）的傢伙，從中作祟，仍然危險。惟一的辦法，是把那些不安分的傢伙拉攏過來，大家算作一伙，分些油水給他們，並且教他們以幫閒之道，當可化險為夷。這是在魏晉以前，有什麼序之教，以及國學太學類的東西，魏、晉、隋、唐以後，方法更簡便，先是什麼「九品官人法」，後來便是「科舉」，方法雖不同，但都極靈驗，唐太宗看了那些忙碌應試的舉子，非常高興的說：「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據說，洋人方面也是一樣，西洋史上寫着，先有大學，後有中小學，而普遍的有中小學那舞台上已經是個獨角了。第四，封上眼睛的一伙，無須再加指點；幫閒的一伙，也只是靠了那騙文解字的招牌作賣身投案的敲碼。剩下來的足够說明教育是一無用處，於是大家便充當警備，層層一層，或茶餘酒後，吟它兩首藉此向那些封着眼睛的人嚇詐一通，表示這「奉天之命」的一伙，畢竟有其不凡之處。以上所說，便是舊中國舞台前幕，那一羣跑龍套打小旗者和教育的一些因緣。

他們壓根兒沒有過教育，雖然有，那也是主子們的麻醉的粉教，他們封着眼睛，度過那悠久的苦難的歲月，說起來，真是不堪回首！

三、此路不通

自從洋人一隻手拿着長槍大砲，一隻手捧着鴉片煙土，闖了進來之後，舞台上便亂亂起來，以前的主角都被擱上線，由京班大戲便一變而為得頭傀儡劇。洋人洋貨一齊上了舞台，洋人經過了他們扮裝好的新角色——買辦——同封建地主們拉起手來，兩隻血的手抓住農民的心，於是農民們在腳線之外，再加上手鐐，脖子又黃又瘦，不成人形。有些心腸軟的哲學家或洋博士們很溫情的摸着農民的頭，流着廉價的淚說：「可憐的命苦的賤人們，你們固然是天生的命苦，但你們也不該這麼黃瘦，更不該這麼悲慘，叫人看了怪討厭的。跟我來，慢慢學好，不要你出錢，我這裏預備好了「鄉學」「村學」還有「平民學校」，只要你肯學好，你一定有希望——你們會知道：肥的豬才會有的肉呀！」然而那些沒有出息的人，實在無法，不要錢也不來學好，他們大嚷「二鬼」「四鬼」或「五鬼」罷了，真該死，沒有希望的傢伙！於是哲學家洋博士們只有換着光頭嘆息。

洋人買辦和封建地主們對於這些哲學家，洋博士，表示很滿意，竟不愧為「哲學家」「洋博士」，不然，那裏會有這一手的好魔術呢？真的，如果把毯子揭開，大家一望便知：眼睛給封上了，手上帶着手鐐，腳上絆着腳線，心被血手抓住，拼命用唧筒往外吸取着鮮血，但是嘴裏只能塞進一點草根樹皮，這是多麼難看的模樣啊，實在太不雅觀。哲學家洋博士們用手把這些地方統統遮起，於是看的人也便安然而笑，甚至有人罵出聲來：「賤貨到底賤貨！」洋人，買辦，和封建地主們相顧而笑，笑裏隱隱帶着淒涼可怕的聲音。

自然，也有人在旁邊忍俊不住，便說破了這魔術的訣竅，他們說：洋人買辦，和封建地主是正兒，哲學家和洋博士有些近於幫閒，雖然他們或者不是有意。試想：一個人身體被細網綁起來，血被不停的擲取，而吃的是樹皮草根，怎麼會不黃瘦不慘苦呢？把鐵錘和鮮血遮着，那只有騙騙自己，騙騙小孩子們，明眼人是騙不了的。他們爲了擲扎着撈一點樹皮草根吃，已經不容易做到了，那裏有閒情來念那些擲

什子的「千字課」，「萬字課」呢！據說有一些國語吧，他們也要換口氣，好多聚點血，「千字課」、「萬字課」裏所講的那些玩意兒，對於他們只是一些好笑的神話，他們一看到將要發瘋，他們要知道的事情，那裏邊都不能告訴他們。比如，他們為什麼給封住了眼，帶上手腳鎖，又怎樣打倒那些吸血鬼，以及怎樣和那些吸血鬼拚個你死我活，來恢復一個平起平坐的場面，他們希望：在那裏，大家仍舊圍在一起，像親兄弟親姊妹一樣的親熱的說笑，誰不再欺負誰，誰也不再討誰的便宜，那時候，他們自然不復黃瘦憔悴，他們生在自由的工作與歡笑裏，大家都活得像「人」。「千字課」並不是必須停着不念，但千字課裏應該說些真話，才有意思，否則一味撒謊的書，還有誰要念呢？

洋人買辦封建地主，哲學家，和洋博士們，聽了這一番話，氣得臉上發青，像蠟一般，青筋都暴出來。

但事實還是事實，眼前擺着兩條路：一條是真的路，一條是騙人的路，真的路是艱苦的。要靠了血的鬥爭，這些，哲學家和洋博士們當然覺得可怕。他們坐在象牙塔裏，築起幻想的路，他們於酒醉飯飽之餘，想那條條美麗的路，要洋人買辦，封建地主，以及農民們，從這路上來欣賞他的象牙塔裏的景色。但是抱歉，在這條路上，不能和「現實」碰面，一碰着現實，就立會吃一個無情的耳光，那耳光很響，彷彿有一種聲音在喝斥着：「此路不通」。但是他們却常常滿不在乎，摸摸耳朵，看看洋人買辦和封建地主的顏色，就又安穩了。

四、傍徨瞻顧

洋人總是洋人，不懂得東方道德，更不懂得夫子的「中庸」之道，有時不免欺人太甚，東洋矮鬼就是這麼一個傢伙。其實，封建地主，買辦哲學家，洋博士，都已用盡了平生修養的工夫，屏住氣息，擰手擰腳，很怕得罪那些矮鬼們，但「怕」又有什麼用呢？終於耳光打在臉上，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確是耳光，雖然也有人企圖用幻想來遮羞，但總有些不好意思。終於文場變成了武場，舞台上充滿了騰騰

的氣氛。

撕殺開始的時候，大家一齊應付，倒沒有什麼問題，但殺了幾個月合之後，有些人，坐下來定一定心，想想有些不對，比如：有的人覺得矮鬼不錯，不該和他相打，於是帶領一支人馬，跑到矮鬼營裏，叩頭陪罪，矮鬼自然歡迎，就加以收留，給畫上鬼臉，算收一伙。有的人雖然不知矮鬼好，但想問一些喝血的西洋鬼子曾經一同申演過主角，或者曾被那些鬼子們捉過，手上嘴上的血跡還沒會乾，如果場面變成了，說人們爬將起來，那還得了！所以還是早些和矮鬼們和的好，可以仍舊唱老戲。也有的人，雖不會和鬼子們拉過手，但也偷偷摸摸的吸過幾次血，更有人是祖上以吸血為業的，……這些角色，或者公開商量，或者暗中耳語，都不期而然的把眼光從矮鬼身上仍舊轉到農民們的身上來，大家互相警戒：矮鬼可以放鬆，但農民們，千萬不能讓他們爬起來。

但是，也有一伙不聽舊夢的人，給農民們解了枷鎖，開了眼睛，帶領着他們殺向矮鬼而去，只要他們睜開了眼睛，認清了路，殺些矮鬼，也不算回事，因為，他們要走的是生路，在那條生路上，他們有兩個死對頭，一個是外來的吸血鬼，矮鬼就是最壞的一團。一個是本地的吸血鬼，在長久修飾的巨子裏，他們已經認得很清。不叫要他們睜開眼睛殺矮鬼，必先使他們的手腳腳鍊去揮，只要他們丟掉腳鍊，他們就可睜開眼睛，只要他們睜開眼睛，他們就可把矮鬼殺走，在華北，在華中，以及在別的一地區，這些故事，不時的傳播着，一點也不希奇，一點也不提遺。

此外，更有一些人，說起殺矮鬼的事，可以口沫亂飛，談得很起勁，但一提起解除農民們的腳鍊，就有些難色，他們說，帶着腳鍊也可以殺矮鬼的，不必丟掉，而且丟掉之後，一定會出亂子。哲學家洋博士也露出臉來，隨聲附和，大家一面互遞眼色，一面向農民們說，你們必須忍受一切，聽從命令，等把矮鬼打退之後，我們自有安排，現在不是亂嚷嚷的時候。矮鬼臉上又有些發青，很嚴厲的說下面一句話：誰要亂嚷，誰就該死！

血戰三年多了，從血裏面過了我們的教訓：要趕掉魔鬼，必須靠了農民；要農民們起來，睜開眼睛，必須先給他們解卸枷鎖，不再把他們當作豬狗踩在腳下，不再吸他們的血，而要讓他們像「人」一樣的清淨，不再使他們來打小旗與龍旗，而要大家平起平坐，不分彼此；只有如此，才可能趕掉魔鬼，只有如此，才可能結束那些古怪的歷史的悲劇。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生路，——這是唯一的生路。不過，道理儘管只是一個，但實行却有不同的，有些或者無知，有些却不免故意。然而「事急矣」，已不容你徬徨徘徊，意欲，新縣制，以及「農民教育」這一連串的東西之被提出，不是沒有來由的，不過單單提出是不夠的，還必須重新的提出，而且要認真的洗心革面的實行起來，那麼，光明的前途，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五、遙隔將來

兩千年來，「教育」被玩弄過，也被用作欺人和幫閒的工具，它像一件皇帝的新衣，曾被在貴人們的身上；它像催眠的毒劑，曾被佈在勞苦者的心裏；一邊是刁狡的城市，一邊是愚蒙的鄉村；一邊是玩弄觀念的嫵娘，一邊是缺乏智慧而苦力；教育像一個淑女，她強姦了兩千年，現在是她回頭的時候了。她不要那些惡劣，她應該洗去可恥的脂粉，收起破碎了的心，和那誠實而受狂風吹打們被鏡圓，一齊來建設一個安樂的新家庭。這是教育該走的生路，這也就她唯一的生路。

農民教育將怎樣走上她的新路？我想：

第一，有什麼樣的政治就有什麼樣的教育，舊的吃人的政治是不能再表演下去了，必須有一個新的政治來代替它，這新的政治便是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三民主義的政治。為什麼說「不折不扣，貨真價實」呢？就是我們要忠實實實的去做，而不敢歪曲它，拿它做幌子。國父在誓上寫明：國家民族要獨立，人民要有充分的民主，民生要大大的改善。這三者是分不開的。這一政治的實現，便是舊的悲劇的結束，新的場面的起頭，這是成千成萬農民的生路，這也就是農民教育

的重大目標與基本條件，從今之後，農民教育要為爭取這些目標與條件而犧牲，這是唯一的路，沒有絲毫懷疑的餘地。

第二，目前我們正進行着國父所交給我們的工作，在這過程中，也許有人覺得太難了，但是不，社會發展的規律，抗日戰爭發展的規律，都會告訴了我們，只要我們對準生路決心的去做，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只有那些懷鬼胎的洋人，買辦，封建地主。和貪婪無恥的懦怯者，才會遲疑徘徊，別有企圖。

第三，要特別強調政治教育，把政治教育提高到第一位。增進多一點對抗戰建國認識清楚而數字不多的農民，却不願教成許多數字多而頭腦腦塗的動搖分子。

第四，認清道路，堅定信念，不怕困難，實地苦幹，這應該是今天農民教育工作者的新作風。困難是一切艱鉅事業所必有的，因為困難，所以才愈有意義，愈該努力。

第五，不把教育孤立的幹，一個教育工作者同時也就是一個政治工作者，要把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來投身於教育的部門，「哲學家」——「洋博士」的影子，要從你的腦子裏根本剷除掉，那才不會偏執，不會迷惘，不會變成附庸者，不會變成尾巴主義者。

第六，為了認識的清楚，你必須加強的學習。你的生活當然很苦，你應該把它和整個政治問題聯繫起來看，中國沒有出路，個人當然也不會有出路。你的工作也許進行起來，到處碰壁，但你應該分析那些問題，告訴同道的人以及後來的人，大家商量商量去尋求一個正確的解決辦法。如果你不能提出解決的辦法，你應該指出它的缺點來，——它是屬於政治？還是屬於經濟的？

第七，正確的估計的工作效能，不誇大，也不自餒。

第八，提高與磨練你的工作技術及處人技術，使你的工作得到應得的效率。

我遙隔未來，那裏隱隱的現出了一線的光明，但在到光明的途程中，還是佈滿了黑暗。不過，這不要緊，你聽：農民們已經發出了巨大的吼聲，他們是新中國的主人，我們要為這未來的主人貢獻我們的一切！



淪陷區的農村經濟

秦柳方

一、敵寇侵華與中國農村經濟

敵人早在一九二七年，田中內閣時期，由田中丞一本着敵國明治維新以來的大陸政策，奏請「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主張「征服滿蒙，為征服支那，征服世界的第一大圖」。企圖「開發滿蒙的富源，培養帝國之恆久繁榮」，這就是敵人侵華史上有名的「田中奏摺」。在那奏摺中，最險惡最毒辣關於經濟侵略的一項，明白的說出了：以「經濟提攜」的美名，實行「搜取滿蒙資源，改善滿蒙經濟，破壞東三省貨幣，壟斷滿蒙的貿易和經濟，操縱東北的財政和金融。」

「九一八」事變，由於我們退讓屈辱的「不抵抗主義」，使敵人實現了大陸政策的第三階段，確括了整個滿蒙的經濟利益，接着要求華北特殊化，當時廣田外相又毫不留情地提出了有名的三原則，在經濟上主張「工業日本，農業中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制度。雖然當時曾有少數信不恥而企圖賣國求榮的人士，認為「農業中國」與「以農立國」精神相符合（？），暗中與敵人互相呼應外，終於侵略者所高唱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口號，為我全民族英勇的「七七」抗戰所粉碎了。

由於我們全國人民的奮起，給予敵人無情的打擊，敵寇首相近衛本著「速和速結」的策略，又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出了所謂「近衛聲明」，夢想建立「東亞新秩序」，「強化經濟平化」，「確立中日滿經濟集團」，這是一貫的「經濟提攜」「經濟合作」。而事實上則為激頭激尾的經濟掠奪，在這「引誘」之下，只有民族敗類汪逆精衛的一夥，脫離了抗戰陣營，走進敵人的懷抱，甘願為他們的傀儡，於二十八年十二月，秘密和敵人簽訂了賣國協定「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公然接受了「經濟提攜」，不僅斷送了「華北蒙疆」之資源，而且接受了全國一般經濟的「開發」與「結合」。去年十一月汪逆更公然和日寇簽訂賣國條約，其第六條就是斷送全國資源，出賣全國人民的經濟利益，而反美其名曰：「依據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之精神，並依照平等互惠之原則，於經濟方面謀密切合作」。當然汪逆醜類的此等鬼蜮技倆，誠為「總裁」指示，不僅是企圖出賣民族利益，實在是「存心賣祖和子孫，而求個人的富貴榮華（？）」。亦為我全國人民所堅決否認，共同唾棄的。

同時敵寇由於侵華戰爭的整個失敗，自我第二期抗戰以後，被迫放棄「速和速結」的迷夢，不得不改變戰略，實行「以戰養戰」，而喊出了「百年戰爭」的口號。

於此我們應該了解，敵寇所謂「經濟提攜」，「經濟合作」，以及事實所告訴我們的：「九一八」事變，敵寇搜括滿蒙，「七七」事變，敵寇佔領華北華中等區沿江沿海若干的城市與交通線，甚至敵寇計劃中之南進行動

掠奪南太平洋，其主要目的，是在資源之掠奪，與經濟利益的獨佔。

為什麼敵人定發動侵略戰爭？為什麼敵人定要執行南進政策？為什麼定要把我資源，獨佔我經濟利益？那我們應該簡捷的回答，由於敵寇是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本來，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因為：（一）生產力的擴展，需要一個可以獨佔的原料生產地；（二）在資本主義剝削關係下所引起的大眾購買力的降低，尤其是法西斯獨裁國家下的消費限制，需要一個可以獨佔的商品銷售市場；（三）資本的不斷積聚，需要一個可以控制的資本輸出市場；（四）由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所必然產生之經濟不景氣與利潤低降的不斷威脅，需要一個可以獲得超額利潤的來源。綜合了這些原因，也就是以說明現代帝國主義國家，為什麼定要以軍事佔領，來掌握殖民地的主權，實現對開拓區域完全獨霸；甚至對全世界殖民地業已分割完畢，侵略者更不得不瘋狂地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使全世界大多數人民遭受被屠殺被殘害的命運，以實現殖民地的再分割。亞洲大陸，在敵寇看來，是一塊未曾割完的肥肉，而且又在他的門邊，隨上去似乎易如反掌（？），於是他的「大陸政策」的訂定，俾使戰爭的發動，以至於南進政策的行動，也就是要他在亞洲大陸找尋他獨霸的殖民地，以解救快要崩潰滅亡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命運。

近百年來的中國社會，他是由古老的封建經濟步入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地位，但由於敵人瘋狂的侵略，却使中國社會的性質，不得不改變其趨向，抗戰建國，他將使中國社會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走向獨立自由的道路，他將使中國社會，揚棄舊的桎梏，茁長新的經濟萌芽。而淪陷在敵人鐵蹄下的城市及其附近區域的農村，更是不幸裏沒有新的力量之成長，也就無可避免地暫時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所以敵寇的侵略，是改變了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

二、淪陷區農村經濟的特點

敵寇佔我淪陷區，其目的既在獨佔原料生產，控制資本輸出市場和獨佔商品銷售市場，獲取超額利潤，那麼在這一經濟關係的支配之下，淪陷區的農村將發生什麼影響，農業具有那些特點呢？

第一，是土地的被掠奪，敵寇每到一地，常常佔領農民的大量田地，建築飛機場，軍火倉庫，堆棧，兵營。而敵人為了保衛他的佔領地，常常築起很密的公路網，這些公路路旁所佔的田地，當然也是強佔來的。有些地方，敵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就強迫強佔農民的田地，強為農場，甚至實行移民，把圈定的大批農田，分配給他們的移民耕種。例如：「在江南，敵人把真茹，大場，吳淞，楊思橋，閔行，龍華一帶的農田，武力強佔，分配給日籍的移民種植，把殘有的房屋，拆毀或燒毀，建立起日本的新村來。」（新華經濟講座）在華北，敵人為了想使河北成為他的棉花供給地，就由「滿洲紡織株式會社」以六百萬的資金，利用永定河的水源，強佔南苑一帶的民田，開闢廣大農場。冀東方面，敵人的「冀東種植公司」亦強佔我農田地幾千幾萬畝，組織所謂「東洋民生農場」，在東北，利用整理土地，冒充地主，借口移民，實行併村等名義，大批掠奪土地。民國二十六年以前，就佔領了幾十萬畝（每畝十畝），二十六年以後，日寇更訂立了移民二十年的計劃，改組「滿洲拓植株式會社」，資金擴充至五千萬元，決定自一九三七年起分四期向東北移民百萬戶，每戶授田十町步，（每一町步合中國十六畝）共一千萬町步，即共需一萬萬六千萬畝，佔東北總可耕地面積三千八百七十萬七千二百二十畝的三分之一強，超出了現在已耕地面積的一千三百八十萬二千三百七十畝（見淪陷九年的東北農村）。在敵人無情的土地掠奪之下，那原有的農民只能含淚地離開了世代相依的土地而飄泊到異鄉。這是敵人在淪陷區內慣常地施行的，極端殘酷的超經濟的對土地的掠奪。

第二，是農村勞動力的破壞。敵人每到一個地方，往往大批的殘殺我農民，有時則強迫我農民服工役或兵役，或者強迫投入偽軍，由是農業生產力大減，田畝大量的荒蕪了。「在江蘇的江甯，句容，溧水，江浦及六合（半縣）等四個半縣中，無辜被殺的就有四萬人」（亞美雜誌）這四萬多人中，當然以農民佔多數。在京滬一帶，在上海近郊，被敵偽誘捕後入苦工營工作或充軍中服役者，也有着很大的數目。「在鄂中一帶，昔日之官戶和地主，類已遷入內地，多數壯丁，亦已逃入深山，或被發徵徵作壯丁，參加偽人民自衛軍，故壯丁之數目與日俱減」，因而「田地日漸荒蕪，僅三分之一尚在繼續耕種」（掃蕩報）在華北一帶，被敵偽有利誘而出關供其奴役者，在三十萬人以上。在東北，由於敵寇的併村與集家政策，以及胡匪的蹂躪，致使農民所有相距屯基偏遠之土地，乏力耕種，即勉強耕種，而所得亦不抵所出，於是相率甘願拋棄田產，任其披荒。這樣大批的農民既離開了農村，農業生產所受影響，當然是極端巨大的，至於沒有離開土地而常受敵寇騷擾的區域，其生產力之減退，影響亦復不小。

第三，是農產品的商品化。敵寇在淪陷區內，採取原料生產品，亦為其重要的侵略目標之一。如在浙西由敵寇三井洋行的茶葉部主持茶葉的掠奪，一面利用偽組織「偽三井管理委員會茶葉委員會」協助其執行茶葉統制工作，一面抬高價格，以事掠奪，計二十九年九個月中間，餘杭一地掠奪茶葉之茶葉，即達五十餘萬斤，二十八年浙西茶葉被敵寇用走私方法收購者達一萬担以上。二十八年敵人在江浙淪陷區復實行統制茶葉的收購，浙江長興一地，年產茶葉一萬一千担，該年走私而後收購者即達萬担。二十九年又進一步統制生絲。前年蘇南收購，則高價收買，加工復制輸出，藉以獲利，去年則因美國生絲市場慘跌，敵寇本身亦係生絲輸出國家，為顧全其自身利益，絲繭收購，又大為跌價，如二十九年蘇南每担價二五〇元，秋繭則僅至每担一二〇元左右，于蘇區無不叫苦連天。在華北敵寇則盡量掠奪棉花，因為那裏有棉田百萬畝以上，年產額達二十八萬六千噸，而敵寇國內本每年需要六十萬噸，所以與中公司，早就擬定了華北植棉五年計劃，「七七」事變以後，又在華北成立中日合組的「華北棉產改進會」，為掠奪棉花的統一機關，訂立了九年計劃，企圖完成增產一千萬担，強迫農民少種糧食，多種棉花，並以低價統制購買，獲取厚利，如二十七年秋天，敵寇在未收獲前訂出了最高的價目，強制西河美國種每担不能超過三十八元，而當時天津同樣的棉花價格，却是每担六十五元左右，自然農民是受了嚴重的剝削，所幸我華北軍民提出了「多種糧食，少種棉花」的口號，和敵寇作堅決的經濟鬥爭，雖然敵人掠奪了大部分的棉花，但是華北的棉花生產，却並沒有因為棉產改進會的九年計劃而有何增加，例如九年計劃中，他們計算二十七年度能增產棉花四百二十萬零四千担，二十八年增產四百六十五萬三千担，可事實上，以河北省而論，二十六年植棉土地，有一千一百四十二萬畝，二十七年減至五百四十五萬畝，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二，二十六年產棉一百六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七公担，二十七年只產了一百零二萬三千二百九十一公担，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九。（見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報）就是淪陷區的糧食生產，也日益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在江南淪陷區，糧食完全由三井，三友及軍部合作統制，結果，敵人把米大批運去，運一向產米的無錫，常熟，無錫，反而發生米荒。就是浙西和上海的米糧，主要原因亦由於敵寇的統制與掠奪，用作軍糧以及輸出所致，即在東北，主要農產品如小麥，大豆，高粱等亦無不為敵寇掠奪，而糧食，如東北二十八年小麥商品化率為百分之七十九，大豆商品化率為百分之八十三，高粱商品化率為百分之四十二，（見淪陷九年的東北農村）這就是說連糧食作物農民也被迫以低價賣出，高價購進，甚至不得不以粗糙的粟米用作貧民食糧，所以農產商品化以及農產統制，也是迫使淪陷區農民走向飢寒死亡道路的原因之一。

第四，捐稅和高利貸的榨取。在江蘇江北有些被敵寇佔領的地方，賦稅之重，超過戰前三倍。汪組織成立以後，冒充「正統」措施，通令各省市，所有稅捐，仍應遵照民國廿六年七月以前國府公佈暨行政院核准之法令施行。去年浙西一帶淪陷區，偽組織對各項稅收如田賦，營業

稅等以管理為名，一切照舊徵收，並巧立名目，如自治戶捐，自衛隊捐，騎戶捐，節稅，特別人口捐，貨物進口（實為進城）稅，茶碗捐，奇派勒索，無微不至。在豫東，「人民除納糧之外，每月每畝還納小麥二斤，至於臨時所辦『剿匪軍火費』，還不在其內」。（見大美晚報）在華北，如安陽，農民每畝地要納稅七八元以上，去年蟲災水災，接踵而至，每畝田地的收穫，充其量只值三元左右，不但不足支付租稅，反而要大加失本。該地其他稅捐，計有：牲畜捐，屠宰捐，織捐，牙捐，棉捐，木石捐，煤捐，牙捐，苦力捐，津汗捐（即糞捐）報捐，資本捐，營業捐，鹽稅，統稅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若華北治匪區）在東北，偽滿歲入總額三萬萬四千五百五十五萬元的百分之七十四，為租稅與專賣利益的收入，如以偽滿已耕地一萬三千八百萬畝計算，每畝負擔，已快達到兩元，而且實際上一切特別捐，臨時攤派的數目總是要幾倍於正稅，農民所苦的不是正稅，而是特別捐和臨時攤派。至於高利貸，則在漢奸，奸商，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結合之下對農民施行其殘酷的剝削。在江蘇的浦南區中，「經營高利貸者大多是賍賈仇貨，為敵人收買農產品的奸商。他們常常在春大以低價預購農產品，二三元之本錢，可以賺上三四元的利息；現金借貸，年利平均在四五分以上，且須有相當家產，信用良好者，才能借到；否則，就須用土地抵押，因此土地迅速集中，農村迅速分化了」（本刊不詳日期）在浙西，敵偽策動的合作社，如餘杭平湖的消費合作社，是在奸商推銷仇貨，崇德、吳興、海鹽的運銷合作社，嘉興的紙筋生產合作社，則均為敵人把持，在東北，金豐合作社，幾乎每縣都有，廿九年六月末貸出款項達一萬萬一千萬元，貸款利息規定月放款月利三分二厘到四分，担保放款，三分到三分八厘，借款額數，前者可高達三百元，後者可達千元，因為農民需款殷切，貸借結果，以地產為抵押者，因對時無力償還，土地往往被沒收。即使有力償還亦因借款期短，收成剛上場已感周催收，不得不廉價出售，向金融合作社借還本息，所以存積貸款，充含有買賣苗圃的意義，至在一般無抵押無信用之貧民，自然無法借到款項，於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可以在金融合作社用三四分的利息借入款項，再以更高的利息轉放給貧農，加重剝削。所以此種貸款，無論是造成上述那一種的結果，總是在表面上是開發農村，救濟農民的商業金融的流通，實際上則為進地的農村高利貸的奇重剝削。

第五，是工業品的傾銷與金融的統制。敵寇兩品的大量傾銷，不僅在戰後，在戰區，而且在我們的後方也深深地感到，敵寇在淪陷區事實上已完全排除了第三國在華的市場，壟斷了貿易。如據皖邊界顯小旁的一個小集——界首，「奸商，地痞，和權勢者，便利用封建勢力，逃過檢查處，大量走私。」「每天的貿易額約三四十萬元，有時每天竟達一百六十萬元」，（廿九年四月七日東南日報）又，「以江西吉安進口的仇貨，據封鎖區的統計及加上走私私的估計，每月進口，當在五十萬元」。（浙江省戰地台工）此外，敵人以上海，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京，蕪湖，九江，漢口等據點，在華中進行走私工作；以海州，廣州等為據點在華南進行的經濟侵略；以青島，天津，北平，濟南，開封，大同，太原等為據點所進行的華北走私工作，為敵寇是驚人！據亞美雜誌所載，「一九三八年，日本佔領了中國十省的主要交通路線，中國入口貨物百分之四十六是來自日本，只把日本佔領的區域計算，日本貨已佔了市場百分之六十五，而且在東北七七事變以後，偽滿工業製造品和農產物價格之間所形成的剪刀差，是猛烈地增大，譬如，若以一九三三年平均為一〇〇，那麼東北輸出品，（主要為農產，尤其以日本為主要對手）的價格，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是一五三・四%，但在次年十二月則達到一六三・四%，而騰貴率是六・五%，但在輸入品（以上輸出品為主，而且大多是由日本輸入的。）方面，在同期却由一一六・二%，騰貴到一五八・六%，而騰貴率是三四・五%，這明顯的表示東北輸入的工業品比輸出的農產原料是要騰貴得多。至於貿易入超，僅東北一區，一九三九年達九億五千七百萬元，這當然也是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并且隨着在淪陷區於掠奪農產品，傾銷機製品的過程中間，還運用了金融統制的策略，驅迫使用偽幣，貶低法幣價格，甚至在農村中強迫法幣，並取外匯。如華北偽組織發行偽滿銀券，就極力破壞我法幣，於廿七年六月下，禁止中央無地名券及申交南字券在華北流通，於八月將法幣

減價一成；後於廿八年二月將法幣減值三成，三月禁止所有法幣在華北通行。如敵寇在華中強行規定法幣一·五五元折合偽幣與一元，在冀州強迫人民以法幣向河銀行兌換現款，并規定每軍用票一元兌換法幣一元三角，潮安偽幣特會則規定一元軍用票換法幣三元。此類事件，均屬強迫人民以無價值的軍用票或偽券企圖代替法幣的流通。總之商品大量傾銷，形成貿易入超，同時工業製品和農產品價格剪刀形的發展，以及貨幣金融的統制，正是敵寇在淪陷區的農村中進行經濟掠奪另一種的重要手段。

第六是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被維持，敵寇在東北在華北雖然開闢了若干的農場，但並沒有在農村中推進資本主義式的大規模耕作，還依舊維持著小農經濟和小佃農經營的形態，就是敵寇自願的少數農場，也是殖民地種植場的性質，據悉土地之外，還充分利用農具周圍小佃農的廉價勞動，為其耕作。而淪陷區一般農民的經營形態，則以農業技術的未發達，農具面狹小，無法採用新式農具，小農經濟和小佃農經營的被維持，這與一般殖民地的農村一樣，是必然的趨勢，同時因為敵寇在淪陷區加深了農產商品化的程度，一方面又大量傾銷工業品，使貨幣經濟深入農村，隨之而來的就是農民內部的兩極分化，土地向地主集中，富農數量增加，中小農民則日益貧窮化。至於封建的榨取關係，則根本沒有改變，依舊被維持著，甚至愈益鞏固了。那裏的地租，雖然因為若干地區，由於貨幣經濟的發展，貨幣地租也發生了，其落後區域，佃農還要負擔各色各種的中世紀的義務，例如地租外的實納稅役的供給等，但大體說來，地租的主要形態是物納地租，也就是說農民生產物的大半，依舊是為地主，像我們後方，正在竭力謀求全面推行的土地法耕種用條款，以減輕佃農負擔，保障農民生產的工作，在那裏是連做夢都無法想到的。

第七，維持了落後的封建勢力，淪陷區農村的生產關係如前所述，但我們應該進一步指出，敵寇在淪陷區因為要實行經濟掠奪，除軍事佔領外，更在政治上，維持了落後的封建勢力，做剝削的工具。在淪陷區的農村中，落後的地主豪紳們，為了保存他們私人的利益，就甘為新利用，使其驅使，去剝削與壓迫農民。所有各地維持的傀儡們要是我們仔細分析的話，大半是土豪劣紳，或者是代表土豪劣紳利益的爪牙。所有敵偽統治的機構以及各式各款的私私機關，也多半是這一夥人所包辦，因此，在淪陷區中往往漢奸，奸商，高利貸者是三位一體的結合者，聯合的對農民施行殘酷的剝削。甚至淪陷區後方落伍的廢敗的軍人，也作為敵人間接利用的對象，「江海由××帶領的軍隊，擔任着滿鐵公路沿線的守戒，他潛着私的賭博，設着「關卡」，碰到貨物，每担每載只要繳納幾十元，便可通行無阻。」（廿九年一月十九日大衆晚報）在淪陷區亦有雜色隊伍，借辦軍糧為名，武裝走私，並販運鴉片。「武裝走私在長興是公開的祕密，有一種地痞，藉着勢力聯合軍隊偷運，並帶着槍上頂了機關槍，腰間掛了木壳槍，茶葉一袋，更走私幾百磅，藉端要上萬元。在組織之下的偽軍，也無一不是落伍的廢敗軍人，在那裏苦撐場面。就是法組織本身以及其可能控制各級行政機構，也明明白白的代表著最反動的落伍軍人享受（？）不願國家民族利益的政客集團。他們為敵人當傀儡，出賣民族國家的利益，雖然在敵寇「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侵略指使之下，允許其勉勵登臺，事實上還不是做了敵人經濟侵略的工具，成為剝削中國農村經濟的幫兇。

總之，淪陷區的農村，土地被掠奪，勞動者被破壞，農產剝削商品化，捐稅和高利貸異常猖獗，敵寇的機製品大量傾銷，而且是不等價的交換，加上金融統制的剝削，維持着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更扶植落後的封建勢力，變成他們的侵略工具，這樣，也就統制着淪陷區的整個的農村經濟。那裏的農民大眾，除却非進反政和鬥爭的隊伍，也就不得不喘息於被榨取被剝削的苦難的情況之下，日漸走上飢餓死亡線上，而遲早逃不了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命運。

三、淪陷區農村經濟的前途

我們指出了淪陷區農村經濟特點，或者有人會懷疑到：「敵人既如是的統制着整個的農村經濟，那不是我們將陷入悲慘的殖民地的命運，永遠的以爲敵人的奴隸，千萬年不得翻身嗎？」不，這是敵人的企圖。也是我們的遠慮，我們相信這是不可能的，因爲事實上不僅敵人佔領的祇是城市及其附近的鄉村，敵人可能破壞和榨取的農村，在全國說來，還沒有佔着怎樣的比重，就是汪逆漢奸傀儡，也只有在敵人的羽翼之下，才能夠苟且殘喘，他的罪孽，絕對不能蒙蔽每一個民衆，他的醜行，絲毫不能獲得任何一個民衆的諒解與信任，而且我們巨大的敵後根據地已經建立了堅固的游擊根據地，由於那裏民衆一致的艱苦鬥爭，已經生長着新的經濟關係，而且有着合理的政策和民主的政權保障着，朝着欣欣向榮的前途邁進。

所以淪陷區的農村經濟，很明顯的有着兩個前途，或是擺脫了桎梏走上自立更生的道路，或是漸漸地淪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我們今天的任務，是在如何的團結力量，堅持抗戰，何時鞏固和發展游擊區，建立新的經濟基礎，藉以擊破敵寇殘酷的經濟封鎖和破壞農村的計劃，要是不求進步，分散力量，以致影響到游擊區的發展，爲着着新的經濟基礎的成長，那就是幫助了敵人的侵略與剝削，踏入了殖民地的道路，走上了奴隸的頭台。這是很明顯的，全在我們自己的抉擇，一致的努力！

三〇，一，七於桂林

（本文由三一四接來）

「計口授糧」不是像做一紙法令和成立了應有的機構就算完成的，若不通過民衆自身的組織，不通過政治動員，不通過有民主精神的下級行政機構，就立刻會發見「計口不濟，投糧不均，飢者不得食，飽者有餘糧」的種種現象，郵縣的情形就是如此，郵縣縣府當局對這次計口授糧的實施，似頗抱有一番決心，對「私販」、「暗盤」等情，亦在嚴厲查禁之中，但在實施已經月餘之今日，一方面米價在行政力量平抑之下，對豐升斗米的小民，已有若干裨益，一方面，却是弊叢叢生，與主持當局的難乎爲計。

三一 一個事實

也只能說「得天獨厚」吧，記者就生在郵縣的一個不產米谷的山鄉，鄉人除在山麓種植桑麻菜蔬以外，只在山頂和山腰種植番薯和芋艿，其爲數也極小，且不能久藏，每家至多不過補充一月的雜糧。自郵府實施計口授糧以來，鄉裏也開了一升糧食公店，公店名義上雖由商人呈准政府開設，實際上所謂商長和鄉長均有暗盤。我們鄉裏約一級小地主（大都爲保甲長）有田在異鄉，今年雖不能收租谷，但多已「抱親謀眷」或與公店股東串通，設法買足食谷，至於佔大多數的中下等小民，只有逐日向公店購米了。向公店購米，只能依縣米廳所規定的限量去購，每石價加運費爲三十五元，但不能

每日或每次依限量購得，因爲郵縣的郵區說，城區是佔最緊要的地位，能購之糧，只能向指定之餘糧鄉購入多少，就出賣多少，因此所計口授糧往往隔三四月允購一次；在這一途中，也往往因購者衆多，後來者就買不到，公店之前，鄉特種隊揚揚鞭，老婦小孩多鵝候食日，不待一粒，山鄉地區亦鬧，爲購一日之糧，翻山越嶺，來回至少須半日時間，購不到也只有垂頭回家，待明日再來，至於鄉保甲長的家，積谷已可吃「對年」，你必是請求他們設法，他會回答你：「對你們繳收戶捐，兵役費，於我有份，對你們餓死，與我無涉。」

（完）

農村調查：

祁門毛茶的產銷過程

唐海

安徽茶葉，名滿國際市場。二十八年出口華茶三千萬元中，皖茶價值幾近全部出口價值之一半，而祁門紅茶品質之優良，以及色、馨、味之美，不備為皖茶之首，其價值高，品質優，為華茶中質地最佳者。在國際市場，祁門亦有其極重要之地位。

抗戰中祁門更爲多數人所重視。在全華茶輸出作爲軍用外匯，支持持久抗戰經濟的目的，祁門無疑地也成爲經濟戰中有力之生力軍。

可是，包括在祁門產銷過程中，是層層剝削，「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蟲蛆」。戰前，據察全部華茶出口之洋行，仰洋行鼻息買辦資本之茶棧，相互勾通，以高利貸，殺價，扣樣茶，吃磅……等剝削內地之精製茶號。而茶號爲求增多本身利潤計，便使用多種方法，壓低製造成本：最顯著者爲壓低毛茶山價，通過茶販，茶行，水客等關係，以經濟鎖鏈，緊箍住茶農。由於茶農之貧困，處於被忽略，被蔑視，衣食不足之狀態，終生艱辛進行其簡陋之生產，又因其生產全部出售，故所受市場波動（均由茶號，茶棧，洋行等操縱）利害關係亦最烈，而所受之剝削亦最悲慘。

茶葉自經政府規定爲統銷物產之一後，（戰後）當地茶號，已能除去已往一切受洋行茶棧操縱下之陋規，直接在產地售予政府收購機構；亦即自經政府統銷後，茶號已往之與茶棧，洋行之關係，一變成爲與政府關係。製成箱茶，價格正當穩定，一切出口運銷，全由政府辦理。然對待茶農種種剝削陋規，依然如故，迄未改良，致有茶商大發財，而茶農因售出毛茶山價過低而叫苦連天之矛盾現象。

其實，茶農爲茶葉最基層生產者，毛茶優良與否，爲決定精製箱茶品質優劣之先決條件。毛茶製成之優良，不僅爲單純技術問題，更重要者係以茶農生活及經濟狀況以爲轉移。生葉採前之培植過程，如田間工作中耕，除草，施肥，茶農經濟稍能靈活，即能及時進行，反之，米根無着，無日不處於半飢餓狀態中，非但茶葉品質不能改善，已耕耘土地之茶樹，亦只能聽其自然自滅而已。

廿九年三月安徽省祁門茶葉改良場曾舉行祁門茶農經濟調查，結果將整理編成一份詳細的報告，茲將其中毛茶的產銷過程一部分發表如左：

農村通訊

浙西崇德縣的反貪

蔡明

京杭國道在浙西的一段，是被稱爲膠腸界的，因爲公路以東，這般被錯雜的溝汊包圍着的密密的桑樹林區，敵人的獸蹄還不斷地踐踏着，敵人的汽艇還不時地在港灣裏橫行着。

樸實的老農韓滿地記得，廿六年的冬天，敵人的砲火轟毀了美麗的莊園，成百的婦女被一連串的拉去關，也記得廿七年的秋天，老刀牌游擊隊整天的打家劫舍，那一天不是在恐怖中過着生活。

在浙西崇德這小小的一個縣份中，也正是這樣，大半的土地一直到現在，敵人還不斷地在桑林裏出沒着。但許多地方的民衆還羨慕着崇德，也是崇德民衆引爲自傲的，却因爲崇德北郊和吳興縣交界的地方是浙西區軍的根據地，在這區域裏，不斷地發生着戰鬥，每一個村落的民衆，都能數着他們附近的河池裏流過多少回國軍的血，流着着飲佩的表情，敘述國軍的英勇戰鬥和不怕犧牲的故事。

每一次敵人闖進村莊，總是嚴厲地詰問着國軍駐紮過的人家，但是誰也不肯講，他們雖然常常因此而受到殺戮，斃房子的威脅

一、產製成本

1. 生葉

生葉培植之是否優良，係決定優良毛茶之先決條件。祁紅之所以聞名世界，天然氣候，與適宜於茶樹生長之土壤，實有重大關係。然因茶園另星，分散，茶農經濟能力之枯竭，致使應及時施肥，剪枝，中耕，除草等田園工作，只能聽其自然。此中許或有因科學常識欠缺，未知如何保護，致茶樹漫長山上，地上，聽其自然自滅者；然經濟能力之不足，無法僱用人工，（或家工需另覓好人）當為重要原因之一。

其施肥時期，多在二三月。肥料為油粕，草木灰，與人糞。以每年施肥一次者，為最普遍，亦有根本不施肥者，二次者亦有。惟戶數較少。中耕除草時期以三月八月為最多，全年中耕除草二次者較普遍，也有在七月一次者，也有三月，六月，八月共施行三次者，惟為數極少。

所查茶農八十二戶，合計生產生葉一二〇。九九七市斤，總值一三。七七七。三六元，費於肥料者四六〇。六〇元，費於培植時人工者，三八四五。〇二元，費於採摘人工九四七一。七四元，合每百市斤採摘費成本一一。三九元。

所用肥料，以茶油粕居多，每担自二元起至五元不等。草木灰購入較少，多為自有。人糞亦有購買者，兩項合計僅六〇元，採葉人工因有高山，低山區不同，其每百斤採葉工資亦有差異，自八元至十四元不等，以八九元之間較多，採摘每百斤生葉時間最少僅數天，最多則有十數天，此均將視茶樹所植地位之高下，及地區距離遠近以為決定。

2. 毛茶

生葉採下後，先需凋萎，即用竹篾鋪地上，將生葉平均放其上，置太陽下翻排數次，候生葉凋萎，開始揉捻。方法有二：即用足踏或手揉，足踏力大而易使生葉成細條，手揉則費力而不易成細條，足踏稍欠清潔，而手揉工費事，此為祁紅製造方法上難處之現象，（最好當能改用機械揉捻機，既清潔產量又多）生葉揉捻成條後為青餅，將已揉成條之青餅（生時）置於頂先曬曬日光下之木桶或木盆內，用布蓋緊，用力壓，再置日光下，使之成餅，或將青餅置於竹籠或烘籠內，亦用布蓋緊，在火上烘焙，以至紅褐色為止，最後，為將已成紅餅（由青餅曬成）仍於竹籠上曬曬，或再置烘籠內烘焙使水份蒸散，曬餅至相當程度為止，至此生葉已成毛茶，茶農即可負至茶行或茶號出售。

計算毛茶之初製費用，以生葉成本一三。七七七。三六元加人工，柴炭，燈油等加工費

，但他們從沒有完過國庫，因為國庫對農民也能打鬼子。

二、

崇德現在在我們控制下的祇有一個不大的洲泉鎮了，除了兩家大手工業方式的榨油廠之外，沒有像樣一點的商店，所以他們買一點較好的東西都要趕到十里外的新市（敵區，屬德清）或石門（即崇德城）去，提著空籃去，滿滿的裝着回來，他們到淪陷區去已經慣常了，除了覺得多幾個留有小孩子的東洋人外，還不是和以前差不多，酒店裏不是照樣的熱鬧，米店裏的賬房先生還不是整天換着鈔票。

縣政府，鄉公所的派款，常常增加着，什麼田賦捐例，鄉公所經費，逼步增捐，還有縣政府私自徵收的抗衛樂捐（沈任時），光說田賦捐吧，鄉公所照規定是每畝征收六角，但是實際上要收一元二角，聽說六角錢是秘密送給城裏的偽縣公署的，至于說鄉公所經費吧，報紙上規定只收二十塊錢左右，事實上兩倍都不夠，縣政府天天在愁窮，薪餉發不出，有一個抗日自衛中隊，因為肚子餓竟帶了武器投到偽政府了，縣政府的工役也不全，常常叫兵保長派兵去打劫，然而與知道縣長的錢，那裏來，討小老婆，抽大煙，聽說，他私派一抗衛樂捐，比火還急，雖然浙西行署下了幾道公事之後是禁止了，然而聽說已經搜了五萬塊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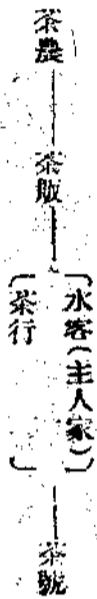
以生產毛茶四六二九三兩斤除之，合每百斤毛茶成本三二·九一元。
初製費用，亦以人工占多，其工資每日自四角起至一元不等，亦有採葉運初製者，惟僅略給津貼二三角。
3. 每百斤毛茶生產成本

每百斤毛茶生產費用，計培植費九·三〇元，占成本28%；採葉人工二〇·四六元，占成本62%；製毛茶加工費三·一六元，占成本9%；總計每百斤毛茶生產成本三二·九一元。生產成本以人工所耗為最多，培植、採葉、製毛茶，人工合計為三一·四三元，占成本95%；而培植所費之肥料，及燈油柴炭等，僅為一·四八元，占成本4%。

成本內尚有田賦地租；茶樹初植時各項開墾與培植費用，以及培植開墾所費之費用利息；器具設備折舊；一部份零星細小之家庭勞動等，因無法取得材料，致未計在內。
成本內工資估計，係包括僱工工資，及家工工資，均係指在採摘採製時所費。家工工資以僱工一半計，如僱工工資每日為一元，則家工係以五角計之。

二、茶行茶號等收購方法

茶農已初製完成之毛茶，以為預防霉爛過度致變劣計，故即須出售。其收購毛茶之行商，計有茶販、水客、水行、茶行、茶號等。茶販係當地或附近比較有勢者，由茶農手中收得毛茶轉售予茶行茶號或水客；水客係茶號派出代收毛茶者，住在毛茶產區內，以其收得毛茶交與茶號；茶行則為抽取佣金或直接代茶農出售毛茶予茶號。水客與茶行之分別，後者為經政府登記，領有執照納稅者，前者則僅以私人名義住在當地住戶，（稱主人家）而不納捐稅者。茶號為收受毛茶改裝精製外銷之商號，亦即毛茶交易之最高收受者，其交易過程如下：



茶農與茶號交易，最多時需經中間關係二次。其所以未直接與茶號發生交易，（亦有直接售予茶號者），原因有三：一、為生產量另極細小，負茶號所在地距離不合算。二、茶販或水客與茶農有經濟關係，如毛茶未製成前，茶農因急需，已向之告貸，致毛茶必須售予茶販或水客者。三、或在周圍有特殊勢力，茶農不敢不售給者。其實，茶農售毛茶予水客，茶販，茶行等，與茶號所開價格亦相差無幾，因茶號亦用種種方法減低毛茶山價也。

，開關德會官的歷史來他可坐第一把交椅，因為土地不到三分之一了，不到一年，竟花了這末多！

三、

事情還不止這樣，今年五月間，剛好在四月間大掃蕩以後，縣長整理了一下廢了的縣政府，重新做替民衆造福的工作了，那時剛好絲綢上市，沒有比這個機會更容易揮錢的了，於是刻出了田賦捐八千元，作為基金，開了一引商行，派他的科長姓孫的和華中公司接洽好，開了一引很大的收購費。

這引神祕的商行開辦了，這位神祕的縣長也隨着長安偽軍錢春桂之約，到上海去加入「安清同盟會」了。商行掛着鮮綸一百八十元一租——比淪陷區要賤五十多元，雖然僅僅只隔十多里路。

鮮綸船一只只的運着雪白光亮的鮮綸到淪陷區去，坐在船上的科長先生發愁了，他大發雷霆起來，鮮綸不准賣到淪陷區去，一定要賣在游擊區裏，軍員公署也出了一張不大給人注意的小布告，內容也差不多，可是對老百姓依然不發生影響！

這叫那位科長先生暴跳如雷了，春綸的市場不過半個月，時間一過，什麼都空，聰明的科長立刻下一道命令，派兩個中隊抗日自衛隊圍攻鮮綸，誰不服從，誰就是……這一批野狗們很快的分散到各鄉村各要道，嗅着鮮綸的蹤跡，給他碰到的，沒有客氣，連人連狗趕到商行裏，農民吃了低價的虧還不分三成給這些野狗們作為酬勞，中間也有不肯給他們酬勞，他們板起面孔：「這是科長的命令」，擺着一頓拳脚！

茶農出售毛茶時所受種種剝削，實屬駭人。如衡器一項，茶業機關規定為十三兩六錢市秤，而收買之行商仍用二十四兩或甚至二十四兩至二十四兩以上之老秤，相差幾近一倍。茶行，水客收買時，每元需向茶農抽收佣金三分，以為手續費。而秤上尚可玩出花樣，少算一二斤不足為奇。（售予茶號時，溢出之數為茶行水客之盈利，每担尚能向茶號收佣金二元）除皮有明除與約計重除二種，如明除為用小秤（市秤）秤皮重，有幾斤算幾斤。其收購時用老秤（廿四兩），而除皮時用小秤（市秤）此種重量間之差額，茶農又需吃虧二三斤。其餘規矩計有：一、以九八折給價。二、除茶一斤。三、不足半斤之斤兩不計價（曰抹尾）。四、不足一角之數抹去（曰鈔價）。

茶販付給茶農茶款時，并不一次付給，或一半，或三分之一，待茶販毛茶脫手已得盈利後，才將茶款交付茶農。（茶號付給茶款時，同樣亦用二十四兩秤，除皮，九八折，撥樣抹尾等等。除亦以放款方法（最低利息二分，茶農之毛茶必須售予該號）控制茶農外，其剝削辦法，亦有多種：如其號本日缺貨，第一二批毛茶收入時故意高價放盤，於是第一傳十，十傳百，茶農肩負毛茶，紛紛發售該號。但一待茶農集集時，收價却立刻跌下，美其名曰：「早晚市價不同」，或故意怪其貨色低劣，或收貨已多等等。茶農因自四鄰如此，肩負毛茶，東奔西跑，至少當有一日，如再久放袋內，或仍肩負返家，則毛茶必將發霉過度，（過度時不僅品質低劣，甚至無用）因此故，雖明知吃虧，價格再低，亦惟有忍痛出售。種種方法，總使生產毛茶之茶農，所得價格，一低，再低，而利潤則歸行商手中。

依據上述，以茶農交付毛茶一百市斤，核算結果，僅得老秤五〇，六七斤結價。而經手人之餘耗，僅以二斤計，除皮，扣樣，抹尾等，合計僅以四斤計，換言之，設每百市斤毛茶山價為五十元，而茶農實際所得，僅二十五元餘，其剝削剝削竟高達百分之五十。

三、近年毛茶價格變遷

三年來毛茶山價變遷		
年 度	最高價	最低價
二十七年	六〇	四
二十八年	八〇	二五
二十九年	一一六	一一二
		每百老斤平均價
		二九
		五〇
		三四·四四

註：二十九年毛茶，在調查時尚未採摘，在編作時已採摘完畢，其山價數字，係後調查所得而補上。

民衆們憤怒極了，胆小的阻攔看縣長和科長，胆大的破口大罵，滿行的門上留下了多少民衆血紅的眼釘下的痕跡，不過十天，滿行停市了，民衆們都在議論着擱擱的數目，有說六百担的，有說兩千担的！拉衛隊的人士撤去了，有的民衆主張燒掉這所行的房子來洩憤。

四、

呈訴狀不斷地送到游擊區指揮部，有匿名的，原因是爲了怕土豪劣紳的報仇，也有不匿名的懸訴着崇德縣政府的罪狀，總指揮也早已聽到這些消息，在忍無可忍之下，下了拘捕科長的命令。

這消息給民衆們莫大的興奮，縣黨部和省政府政工隊更認爲爭取民衆必須澈底肅清貪污，不肅清貪污必定會引起民衆對政府的離心傾向，於是發起了洲泉青年座談會，決定了兩項工作：搜集證據供給政府，深入農村教育民衆並使民衆參加反貪污鬥爭。

爲了使一般民衆害怕結仇不願公開檢舉，大家想了一個密告的辦法，一張張的密告紙不斷傳來，中間有着不少的秘密消息有許多是滿行的職員檢舉的，並且提出了他們作惡的鐵的證據。

總指揮部在大家要求下派來一個姓X的調查員，那知道一到洲泉就受到土劣們熱烈的歡迎，回去報告時，還給鴉片還有什麼東西梗住了嘴吧，切確實的證據瞞住了，土劣們還不斷地活動着賄賂着。

但事實的真相究竟已經大白了，一批批的團體代表和證人有青年，有農民，也有縣

山價以二十八年每百斤平均價五〇元為最高。二十七年皖南局勢緊張，銷茶無法出口，茶商均觀望不前，致山價猛跌，最低價每批僅四元。二十八年經茶葉管理處調整統制後，價格因此而上漲。廿九年毛茶最高價較往年均高，而平均價僅三・四四元。其所以如此，為茶季前久旱未雨及適逢春霜致品質稍受影響。又因海口封鎖，茶號均以此作為論據，而山價遂低落，與去年平均價相差計一五・五六元，達32%。

本年人工，柴炭，燈油，均飛漲，而毛茶山價卻相反低落。雖因品質稍差然茶農所受之苦痛，更不堪設想矣。

計口授糧在寧波

一 似乎是一個奇蹟

如果你從金華動身到浙東去，一路上稍稍聽取一點在耳的米價呼聲，就會發生許多奇異之感，雖然在各地似乎都有了糧食公店，都在施行食糧管理政策，可是米的「官價」，竟有這麼大的差異：金華——每元四斤十二兩，嵊縣，上虞——每石八十五元，餘姚——每石七十餘元，慈谿——四十三元，甯波——三十四元五角。

在波爾「封港」以前，一般人對於物價，有一個樸素和簡單的概念，香烟和洋貨自然越近海口越便宜些，糧食的價格就相反，越走向裏去越貴。金華、江山、慶潭、直到湖南，米價就逐級降低，但現在浙江來說，甯波的米價并不高，尤其與沿海各縣來比較一下，可說是極低了，甯波——鄞縣並

不是一個足食的縣份。一個諸大的商業城市，過去都由洋米接濟；目前洋米既已絕跡，甯波人還可吃到最便宜的米，看來像是一個奇蹟！

然而，這不是故事，這根本沒有一點神奇，事實上甯波的米價，是浙省府所規定的價格，與金華等區不相上下，不過在沿海區似乎是突出的；同時，各縣要實行這一規定，根絕一切私販，囤積的現象，還要看縣政當局的決心和執行的方法如何：

甯波在過去有官督商辦的食糧公司，它沒有一點使人滿意的地方，只是一個向外收購糧食的專利組織，一方面既不能取銷糧商的自由販賣和囤積，另一方面却在所有米價行情上加了一層手續費，在今年青黃不接之秋，沿海糧價嚴重，甯波一帶，總算有旅滬同行的一批洋米接濟；食糧公司也因來源斷

長科長的親戚朋友，到軍部去檢舉。現在縣長都受到法律的制裁，鄉鎮入獄了，但還沒有肅清浙西游擊區前線的刑練，土劣依舊在找求政治上每一個漏洞，來作惡，來破壞對敵政治鬥爭，游擊區每一個熱心的民衆，更應如何的警惕着有效地繼續作反敵偽反貪污的鬥爭藉以樹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充實抗戰的力量！

尙辛

絕與在底爾清而告停閉，乘茲新谷登場，縣縣府即決依省府規定，通令各鄉鎮，禁止人民對糧食的自由運輸，米谷概歸政府統購，縣境內地主不得收取現物租，所有租谷歸縣糧食儲備倉庫收購，地主只能依所得租谷額，折價收取法幣，至城區及缺糧縣鎮，分開糧食公店，發給住戶購米證，依限量憑證購米，這就是甯波計口授糧的實施大概情形。

二 問題就解決了嗎？

做到計口授糧嚴重的民食問題就解決了嗎？要是你敢於正視現實，你一定會願意更逼進一步去問的吧！只有把問題故意歪曲化和迷惘化的人們，才會只以搬弄幾個新名詞為滿足的。

(下接二六頁)

★新書知新
★最近出版

物價與幣值

崔尙辛著

在這個紊亂的書名下之，所包含的實際內容是從當前日常經濟現象出發的一部實用經濟學。作者以中國化的手法對貨幣的實際知識及物價問題作深入淺出的說明。

定價一元

演講雄辯藝術

任畢明著

這是一部奇書，作者完全根據自己的經驗心得，用別創的風格，研究演講辯論和談話的技術及理論。新穎，活潑，具體，而富於邏輯美。任何人讀了都可得益不淺。

定價二元



(即「日本海海戰」)

梅普里

雨波

譯者

暴露。

本書是世界文學巨著之一，在蘇聯萬人傳頌，描寫日俄戰爭時代雙方海戰的史實，舊俄的政治黑暗，社會動盪，海軍腐敗等情形均有最藝術的暴露。

上下兩部

報紙本九元

土紙本五元五